



2023 北京国际模拟联合国大会
Beijing International Model United Nations 2023

2023 北京国际模拟联合国大会
Beijing International Model United Nations 2023

背景文件

危机联动委员会

议题：苏伊士运河危机

青年携手  命运共同

JOINED HANDS , SHARED FUTURE

目录

欢迎辞	1
委员会介绍	2
相关背景介绍	3
一、殖民时代英法两国在中东地区的扩张	3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英法治下中东新秩序的确立	3
(二) 英法在中东的治理和殖民体系的终结	5
二、埃及历史背景	6
(一) 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的建立、兴起与衰落	6
(二) 立宪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	7
(三) “七月革命”与共和制的建立	8
三、以色列背景	9
(一) 欧洲反犹狂潮与锡安主义	9
(二) 20 世纪犹太复国运动的曲折发展	10
(三) 犹太家园的巩固与犹太民族国家的建立	11
(四) 犹阿冲突与第一次中东战争	13
四、苏伊士运河相关历史	15
苏伊士运河危机	17
一、苏伊士运河危机始末	17
(一) 导火索: 苏伊士运河国有化	17
(二) 外交风波	19
(三) 战争阶段	21
二、相关国家态度	34

(一) 美苏历史中东战略	34
(二) 美国态度	35
(三) 苏联态度	36
(四) 伊斯兰世界态度	37
三、美苏对危机的介入	41
(一) 美国	41
(二) 苏联	44
(三) 总结	46
四、战争状态的暂时结束与后续影响	47
(一) 战争的暂时结束	47
(二) 后续影响	47
附录：部分重要地理位置介绍	49

欢迎辞

亲爱的各位代表：

你们好！

欢迎参加 2023 北京国际模拟联合国大会危机联动委员会！

作为最早将模拟联合国这项活动引入中国的高校，外交学院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始终致力于完善和创新模拟联合国的会议模式，为青年学生们提供更好的参会体验，危机联动委员会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危机联动委员会最早出现于耶鲁大学，而最先将其引入中国的正是外交学院模拟联合国协会。在危机联动委员会中，参会代表将扮演国际关系史中的重要人物，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国际环境中，充分运用自己的才学与胆识来面对彼时的危机和挑战，力争在妥善处置危机事件的同时，为全人类增进福祉，并让本国收获荣誉。与模仿联合国机构设置的常规委员会不同，在危机联动委员会中，部分参会代表将扮演各国主要领导人，以决策层的视角面对国际局势，以战略眼光指出解决危机的正道，并在头脑风暴的过程中感受外交与国际关系的魅力。

自从北京国际模拟联合国大会开设危机联动委员会以来，我们一直希望构建一个富有真实感、代入感和使命感的会议。为此我们在长期的探索和实践不断完善会议设计框架与议事规则，赋予参会代表较高的自由度，令其感受到区别于常规委员会的会议体验，并帮助他们从外交博弈的角度理解外交与国际关系的本质。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声尚在耳畔回响，50 年代的世界正在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巨变。意识形态的铁幕将欧洲拦腰截断，使之沦为两个超级大国决斗的前沿阵地；广阔的亚非世界中，自由之火正熊熊燃烧，奴隶和主人就要做最后的殊死搏斗；而在从亚历山大港到波斯湾的广袤土地上，两股生机勃勃的力量将重塑中东世界。数十万犹太人浮海而来，他们要应《贝尔福宣言》之允，回到“应许之地”；而在尼罗河三角洲，一场军事政变改变了埃及的历史走向，并将唤醒阿拉伯民族对萨拉丁的记忆。在血腥残酷的族裔冲突背后，大国各自在中东下好筹码，而所有人关注的焦点都集中在“一把钥匙”——苏伊士运河上。与此同时，一场更大的危机正在酝酿——时隔七百余年，又一次对尼罗河三角洲的“十字军”远征。

中东的未来尚不知将通向何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命运亦悬而未定，都将留待各位代表运筹帷幄，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与勇气，化干戈为玉帛。本次会议将通过完善的内阁设计与贴合现实的内设舆论系统，带领代表们重新体会中东大地上焦灼的紧张事态、感受冷战在全球扩展之时的凌冽寒风。本次会议将引入与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的跨会场联动机制，在引导代表群策群力思考应对、管控危机的集体方案同时，让更多能够体验危机联动乐趣、感受现实国际政治运作模式、了解国家与国际组织间互动关系。本次会议将着力营造拟真外交环境，学术团队在会议中设置的危机事态都是以客观事实为基础的。我们希望参会代表能积极应对虚拟世界中的危机，在此过程中加强对国际关系史的了解，深化对外事工作与国际政治理论的认识，并感受到外交活动的魅力。

“敢竭鄙怀，恭疏短引；一言均赋，四韵俱成。请洒潘江，各倾陆海云尔。”

2023 年北京国际模拟联合国大会
危机联动委员会主席团

委员会介绍

危机联动委员会是一种基于多元多层行为主体之间的信息交换而运行的、通过主席合理推演模拟某特定对象演变的特殊委员会形式。¹ 危机联动委员会区别于常规委员会的主要特征有：

1、会议时间轴是动态的，代表的行为能够反向塑造会场环境，区别于常规委员会静态的时间轴和不变的会场环境；

2、会议行为主体是多元的，包括内阁（国家）、个人、媒体或其他政治实体，区别于常规委员会中单一的国家代表行为主体；

3、代表行为权限相比常委更大，涉及的议题领域也更为多元；

4、会议导向是不定的，危机联动体系的运行高度依赖于各主体间的互动，并没有强制性的议事规则将会场方向导向确定的目标，而常规委员会的会场讨论都最终归于决议草案的起草这一方向；

5、主席团的角色是积极的，可以通过发送局势更新实时参与和修正会场进程，而常规委员会的主席团是居于整个会场之上的消极的主持者，仅能通过会场点评间接影响代表行为。

对于代表而言，在危机联动会场进行角色扮演相比于在常规委员会有两点不同。第一是代表运作会议的方式不同。在传统常规委员会中代表需要在规定的议事规则内进行角色扮演，在特定议题上实现国家利益。而在危机联动会场，议事规则并不是会议所需要考虑的重点，代表所处的环境将是对世界的真实模拟，危机联动会场也因此存在着国家与国家间更强的对抗性，代表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具体决策上而不要拘泥于讨论的形式。第二是代表权限的不同。在危机联动会场中，各分会场作为一国拥有某一特定权限的决策团体，将有着现实中真实的权限来管理运作一个国家并和其他国家展开互动。但需要强调的是，从会议效率的角度出发，作为有议题的危机联动委员会，我们希望代表做出的决策将是和所涉及的议题有关的。

危机联动会场与其他常规会场的不同还有很多，例如代表之间的互动方式，代表获知危机、做出决策、得到反馈的方式。我们将会于会议召开前的适当时间进行专门的代表培训。

本委员会的席位设置与时间轴和时间节点将另行通知。

¹ 作者注：这里给出的定义并不拘于特定的议题背景，也不必要求主席团发送的内容被冠名为“危机”，而只要该委员会设计了多元多层的行为主体、允许它们之间进行信息交换并由主席团做出推演，都可以被视为危机联动委员会的一种或一个变种。这里的“多元”指的是会场中的行为主体应当分属不同立场的不同阵营，“多层”指的是会场中应包含内阁、个人等多层级的独立行为者。因此，某些会议设计的“银河议会”会场应当被归类为危机联动，而“停战谈判”等单纯的谈判场则不被归类为危机联动。

相关背景介绍

一、殖民时代英法两国在中东地区的扩张

英法两国在中东的殖民扩张始于商业的入侵。而伴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英法不满足既有的经济利益，于 19 世纪开启了政治渗透的进程，并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通过委任统治的形式建立了在中东地区的殖民体系。然而由于当地民族主义的情绪高涨，英法对中东的治理一直困难重重，加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冲击，英法在中东各地的统治在 1945 年后纷纷走向终结。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英法治下中东新秩序的确立

在一战期间，英法已和有关各方开展了多场秘密谈判，达成了初步的中东战后设想。在 1915 年的《君士坦丁堡和海峡问题秘密协定》中，各方同意俄罗斯占领黑海沿岸和包括伊斯坦布尔在内的土耳其海峡地区，而俄方承诺不再干涉中东其他地区和伊朗的事务²；同期签订的《1915 年伦敦条约》和 1917 年《圣让—德莫里耶讷协定》中，各方允许意大利占领小亚细亚半岛沿岸和爱琴海诸岛屿；而 1916 年的《塞克斯—皮科协定》更是对英法在中东主体—阿拉伯地区的势力范围进行了划分。根据《塞克斯—皮科协定》，法国得以将黎巴嫩、叙利亚和以摩苏尔为中心的伊拉克北部纳入势力范围；相对应的，英国得以控制阿拉伯的剩余部分，包括阿拉伯半岛和以巴格达、巴士拉为中心的伊拉克中、南部；而巴勒斯坦地区将由战后和平谈判决定，探讨由国际社会共管的治理方式。尽管随着战局的实际演进和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该协定并未全部得到执行，但基本框架已经就此确立。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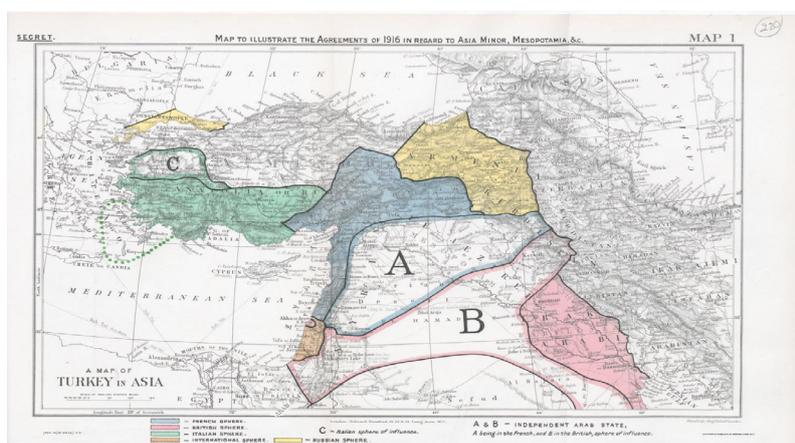


图 1：英、法、俄、意四国在秘密谈判中对奥斯曼遗产的划分⁴

² 李平民：《英国的分而治之与巴以冲突的根源》，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0 年，第 60 页。

³ 王三义：《奥斯曼帝国参战的后果与中东地缘政治的变局》，《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 003 期，第 136 页。

⁴ 维基百科，Peace-conference-memoranda-respecting-syria-arabia-palestine5，<https://zh.m.wikipedia.org/wiki/File:Peace-conference-memoranda-respecting-syria-arabia-palestine5.jpg>，2020 年 2 月 17 日登录。

配合秘密的外交谈判，协约国军队在战场上也发动了针对奥斯曼帝国中东领地的猛烈进攻，相关的进攻主要由英军进行组织。英军兵分两路，一路从印度出发，经由波斯湾进攻伊拉克；一路以埃及为集结地，向巴勒斯坦方向进攻。除正面对抗外，英国还与阿拉伯各民族团体和有声望的部落进行联系，以保证其战后的独立地位为条件来煽动阿拉伯民族反抗帝国的大起义，在《麦克马洪—侯赛因宣言》中，英国明确表示“愿意承认和支持阿拉伯人的独立自主”。另一方面，为获得广大犹太社团的支持，进一步控制巴勒斯坦，英国还在 1917 年向犹太复国运动发表《贝尔福宣言》，宣称愿意“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⁵ 基于此，英国获得了在中东的广泛支持，至 1918 年奥斯曼防线崩溃后，英国势力遍布整个阿拉伯半岛和新月沃土，在中东新秩序的建立中抢占了先机。

奥斯曼帝国签署停战协定后，英法两国在中东的博弈立刻紧锣密鼓地展开。麦加谢里夫、⁶ 阿拉伯民族大起义领袖侯赛因之子费萨尔在 1920 年宣布成为独立的大叙利亚国（包含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国王，此举引发了英法两国的强烈关注。无论如何，两国都无法接受一个完全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在黎凡特地区存在。1920 年 4 月，英法等国召开“圣雷莫会议”，并达成双方具体划界的共识，与《塞克斯—皮科协定》不同，在新协议中法国获得了对整个叙利亚的委任统治权（前者要求在叙利亚内陆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而英国不仅获得整个美索不达米亚的直辖区，还单独实现了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

英法两国在达成对战后中东格局的战略默契后，立即实施了实际的占领行动。1920 年 7 月，法国向费萨尔递交最后通牒迫使其屈服后，占领了叙利亚和黎巴嫩，费萨尔流亡英国。而考虑到美索不达米亚日益高涨的反英情绪，英国放弃了对于该地的直接统治，于 1921 年迎回费萨尔，建立了作为英国保护国的伊拉克王国。“大叙利亚国”的流产和费萨尔的出走极大地刺激了阿拉伯人的民族情绪，费萨尔之兄阿卜杜拉以巴勒斯坦城市安曼为据点，频繁展开对于法国占领当局的袭击。英国担忧法国以此为借口进入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半岛，将约旦河以西的巴勒斯坦地区单独划出建立外约旦，并通过谈判确定由阿卜杜拉担任外约旦国王以换取其停止向叙利亚进攻。

相比于在阿拉伯地区发生的变故，英法等国的土耳其构想则遭遇了更大的失败。在 1920 年土耳其同协约国各国签订的《色佛尔条约》中，该国几乎被完全瓜分，仅保留安纳托利亚中部和北部的部分区域，海峡地区建立多国共管的非军事区，土耳其无权干涉，而英法两国治下的伊拉克和叙利亚也将获得该国西南部的部分地区。然而 1920 年凯末尔推翻苏丹政府在安卡拉建立“大国民议会”，打乱了英法等国既有的部署。随着土耳其独立战争的开展，英法等国被迫与土耳其在 1923 年重新签订了新的《洛桑条约》，土耳其的主权独立得到确认。而此后，新的中东格局基本得到确立，英法两国开始各自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进行艰难的统治。

5 王联：《一战对于中东地缘政治的影响》，阿拉伯世界研究，2014 年第 4 期，第 19 页。

6 麦加谢里夫：管理麦加和麦地那两圣城的领袖，由穆罕默德圣裔哈希姆家族长老担任，1925 年沙特家族占领两圣城后被废除。

（二）英法在中东的治理和殖民体系的终结

尽管在二十世纪 20 年代英国与法国最终建立了对于中东有效的统治，但当局很快发现，无论是在托管地还是在保护国内，英法的政策几乎在每一块殖民地都遭到了层出不穷的抗议与抵制。英法大大低估了中东地区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很快就疲于应付日益抬头的伊斯兰复兴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这些思潮在奥斯曼时代一直蛰伏并积聚力量，而英法在中东地区削弱帝国的行动则助力了他们的传播）。⁷

在法国的势力范围下，法国战前对黎巴嫩基督徒的支持已然使得叙利亚的穆斯林群体难以对其抱有好感，战后不断加码的政治控制则不仅激化了族群冲突，还令黎巴嫩山的基督群体也大感失望。在 1920 年的圣雷莫会议后，法国既明确了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拆分，以显示对于马龙派教徒的支持，同时分化主张“大叙利亚国”的阿拉伯力量。基督徒在黎巴嫩的特殊地位体现在这个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在执政的行政委员会中，基督徒获得 17 席中的 10 席，而在沿海的港口城市，基督徒已经成为少数群体，这无疑招致穆斯林极大的不满。但是事实上，黎巴嫩的基督徒也并未获得黎巴嫩真正的管理权。1922 年上文中的行政委员会即告解散，取而代之的代表理事会甚至被排除在行政决策之外，成为咨询机构，这使得马龙派也对法国专擅的高级专员十分不满。而在叙利亚，情况更加糟糕，自接管以来从城市到农村的民族主义反叛几乎一刻也未曾停息，最终酿成了 1926 年的大规模起义，尽管起义最终被镇压，但法国已不得不考虑在日后体面地解决叙利亚问题。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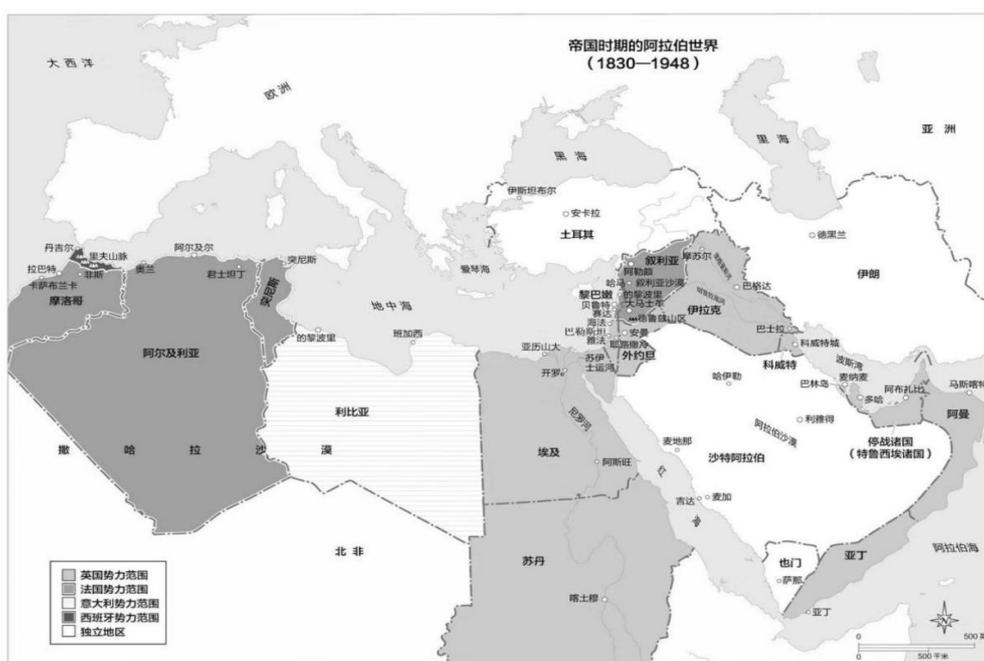


图 2：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阿拉伯世界⁹

英国人在中东的统治也表现出相似的窘态。在阿拉伯半岛，经过一连串战争，沙特家族最终统一了汉志和内志。英国代表在 1927 年与沙特签订协议，给予其完全的独立主权地位；1932 年，沙特阿拉伯成立。在外约旦，阿卜杜拉带来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不断做大，英国政府不得不在 1924 年逼迫阿卜杜拉将他们驱逐出去。在伊拉克，由三个奥斯曼行省强行拼凑成的国家缺乏基本的向心力，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彼此间争端不断，1922 年《英伊同盟条约》中英国在伊拉克各领域所显示的主导地位使得民众对所有来自政府的立法和行政都本能地表现出抵制。埃及尽管在 1922 年的《英埃协议》就已经获得了名义上的独立地位，

7 吴云贵：《阿拉伯、伊斯兰与西方：复杂多变的关系史》，《战略与管理》，2002 年第 1 期，第 42 页。

8 赵娜：《法国在中东的委任统治研究》，博士论文，西北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2019 年 6 月，第 66-70 页。

9 尤金·罗根：《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 年至今》，廉超群、李海鹏译，浙江人民出版社，第 153 页。

但英国仍然控制苏伊士运河并在埃及驻军，同时保留治外法权。埃及人通过英方帮助建立的代议制民主制度表达反抗，主张埃及完全独立的民族主义政党华夫脱党在 1924 年议会选举中上台执政，英国被迫开始考虑与埃及达成新的协定。¹⁰ 英国在巴勒斯坦的统治也宛如一场灾难，在《贝尔福宣言》的支持下，犹太移民潮在战后迅速扩大，仅 1919-1921 年间就有超过 1.85 万犹太移民涌入巴勒斯坦，从 1920 年耶路撒冷的骚乱开始，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暴力冲突乃至恐怖主义活动就持续不断，一直通向 1948 年以色列的成立乃至今日。

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英法两国已经开始考虑在中东的治理成本问题，并逐步决定在保证本地区的利益不受损失的基础上，放弃直接统治。中东的殖民体系在确立仅仅十年后就开始瓦解。1930 年英国与伊拉克签署协定，在保留领事特权、军事基地、军队过境权和石油特权后终止了在伊拉克的统治。英国与埃及在 1936 年达成了类似的协定，英国军队仅在苏伊士运河区和亚历山大港一个军事基地驻扎。伊拉克和埃及两国随后在英国准许下分别于 1932 年和 1937 年加入国联。二次世界大战中两国分别爆发了亲纳粹的政变，尽管反抗都被平息，但英国的特权更加脆弱，并在 1951 年和 1958 年埃、伊两个王国被推翻后终结。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英法在中东的打击远不限于此，1940 年法国战败后，英国立即出兵驱逐了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维希政府，这激起了两国极大的独立热情。1945 年，法国新政府面对不可遏制的起义和法国本土百废待兴的形势，最终决定完全撤出黎巴嫩和叙利亚。在巴勒斯坦，英国在战争中对犹太大屠杀的无能为力和呼吁多民族共治巴勒斯坦的《白皮书》为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所不容，激进分子开始对英国当局和公共设施发动恐怖主义袭击，1946 年大卫王酒店的爆炸造成 91 人死亡，1947 年 7 月两名英国中士当街被犹太激进分子绞死。¹¹ 不待联合国对于巴勒斯坦问题形成最终决议，英国政府就在 1947 年 9 月 26 日单方面宣布撤军，在 1948 年 5 月英国委任统治最终结束时，犹太和巴勒斯坦的民兵早已开始了争夺势力范围的激烈对抗。

到 1956 年苏伊士危机爆发时，英法两国已经从一个多世纪以来在中东狂飙突进般的殖民扩张中退潮，殖民遗产硕果仅存，退缩在包括苏伊士运河区等几个据点之内。

二、埃及历史背景

（一）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的建立、兴起与衰落

自奥斯曼帝国 1517 年灭亡马穆鲁克王朝之后，埃及一直是帝国最重要的行省之一。而在拿破仑入侵埃及失败之后，一位来自阿尔巴尼亚的雇佣军头目，穆罕默德·阿里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利用殖民者败退后的政治真空夺取权力，于 1805 年被埃及贵族推举为总督，随即奥斯曼土耳其苏丹塞利姆三世迫于形势封其为埃及帕夏。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的建立标志着埃及近代史的开始。阿里帕夏在巩固自身权力的同时，希望通过近代化改革使埃及走上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并为此与奥斯曼苏丹以及西方列强摩擦不断。阿里帕夏虽击败了奥斯曼帝国，但其谋求埃及独立乃至夺取奥斯曼苏丹之位的计划最终在西方列强的干涉下失败。

阿里帕夏死后，英法加快了对于埃及的经济和政治渗透。1854 年即位的赛义德帕夏和 1863 年即位的伊斯梅尔帕夏为了对抗奥斯曼苏丹，争取列强的支持，推行经济自由和门户开放政策，实行全方位的欧洲化改革，并开凿苏伊士运河。然而，由于改革步伐过大和开凿运河举债过多，最终国家破产，经济近乎完全被英法掌控，国家主权逐渐沦丧。1878 年，英法逼迫赫迪夫伊斯梅尔帕夏接受英国人和法国人作为其内阁大臣，建立起“双重监督”体制，埃及沦为英法的半殖民地。

埃及人试图反抗列强的操控，但这反而招致了殖民者更为残酷的报复。1881 年 9 月，开罗卫戍司令艾哈迈德·奥拉比发动军事政变，迫使赫迪夫陶菲格帕夏解散亲英法内阁，废

10 孟庆顺：《1923-1952 年埃及的宪政实验》，西亚非洲，1990 年第 3 期，第 52-53 页。

11 尤金·罗根：《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 年至今》，第 320-323 页。

除了“双重监督”体制。这些举措极大地撼动了英法对埃及的控制，于是两国于 1882 年 5 月借口保护侨民兵临亚历山大港，向埃及施压。同年 7 月，英军发起了全面入侵，攻占运河区以及亚历山大港，并于 9 月占领开罗，俘虏并流放奥拉比，恢复“双重监督”体制。至此，

“埃及名义上仍是奥斯曼的一部分，但赫迪夫及其各部大臣都是英国手中的傀儡，只是由于顾忌俄国和法国的反对，英国未敢公开吞并埃及”。¹²

英埃战争结束后直到 1914 年，英国通过各级顾问把持埃及政府，将英国军官安插进埃及军队，使之成为为殖民者服务的工具，埃及实际上已沦为英国的殖民地。1914 年 12 月，由于世界大战爆发，英国与奥斯曼帝国开战，英国单方面宣布埃及脱离奥斯曼帝国而成为英国的保护国，对埃及实行军事管制，并废黜亲土的赫迪夫阿拔斯二世·希米尔帕夏，推举侯赛因·卡米勒为埃及苏丹。

（二）立宪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

20 世纪初，埃及民族主义运动和立宪运动蓬勃发展，埃及知识分子建立了人民党、祖国党、立宪改革党等从激进民族主义到温和立宪主义的政党。一战期间，英埃矛盾进一步加深，阿拉伯大起义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和平纲领鼓舞了埃及地主阶级和民族主义者打破殖民枷锁的热情。作为他们的代表，以萨阿德·扎格卢勒为首的一批前立法会议员于 1918 年 11 月 23 日组建“埃及代表团”（即华夫脱党），期望前往伦敦与英国政府谈判并参加巴黎和会，以取得独立。

然而，英国军事管制当局竭力阻挠，导致支持华夫脱党的首相鲁什迪帕夏被迫辞职，埃及国内混乱情况加剧。次年 3 月 8 日，当局逮捕扎格卢勒等三名华夫脱党领袖，并将其流放至马耳他，引发大规模反英浪潮：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城市爆发暴动，农村爆发游击战，起义迅速席卷全国。迫于压力，英国释放了扎格卢勒等人并同意他们出席巴黎和会。

然而，被华夫脱党人视为反殖民领袖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承认埃及为英国的保护国，并将其载入《凡尔赛和约》，引发了埃及民众的不满和反英斗争的持续。12 月 7 日，英国派遣的以米纳尔勋爵为首的调查团抵达埃及，试图与华夫脱党进行谈判，但遭到了抵制，没有达成实质性进展。福阿德一世苏丹在接见米纳尔勋爵时重申，必须废除保护国体制。因此，英国政府于 1920 年 6 月开始与华夫脱党的代表进行谈判，最终达成了《米纳尔—扎格卢勒联合声明》，名义上承认埃及独立，但实质上保留了大量在埃的既得利益和特权。这份联合声明在埃及各阶层中引起争论，最终导致华夫脱党分裂。

1921 年 3 月，温和派领袖阿德里·亚冈在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艾伦比的支持下被任命为首相，并主持与英国的谈判。在 4 月 22 日的演讲中，扎格卢勒向首相阿德里帕夏就对英谈判提出了四点要求：“第一，代表团谈判的目的是废除埃及和所有国家的不平等的条约；第二，要让全世界都承认埃及的完全独立；第三，废除军事管制和新闻审查制度；第四，代表团的领导人和主要成员必须从华夫脱党之中选出”。¹³ 这次演讲极大地激起了埃及民众反对与英国殖民者妥协的抗议活动，但也使妥协派和激进派尖锐对立，导致了华夫脱党进一步分裂。

首相阿德里帕夏于 7 月率代表团赴伦敦谈判，至 11 月无果而返，被迫辞职。而得到了城市名流、中等地主和乡绅坚定支持的扎格卢勒，则在埃及不断发表演说和文章、组织集会和游行，最终在 12 月被英国当局逮捕并流放。这导致埃及民众的大规模示威，埃及局势急转直下，英军已无法完全掌控局势。英国专员艾伦比被迫于 1922 年 2 月 28 日发表声明，代表英国政府宣布终止保护制度，承认埃及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但在“1. 大英帝国在埃及的交通线的安全；2. 埃及抵抗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外来侵略或干涉的防卫问题；3. 保护外国人在埃及的利益和保护少数民族；4. 有关苏丹地区的问题”¹⁴ 等方面维持现状，英国保留处置权。

12 雷钰、苏瑞林：《中东国家通史·埃及卷》，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213 页。

13 孙笠：《一战后埃及的政治研究（1918-1930 年）》，硕士论文，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7 年 5 月，第 24 页。

14 潘光、朱威烈主编：《阿拉伯非洲历史文选（18 世纪末-20 世纪中）》，邓新裕等译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以此为标志，埃及正式独立成为主权国家，称“埃及王国”。然而，埃及人民争取完全独立的愿望远未实现：英国仍能通过各种手段操控军队和政府机构；外国资本几乎能够完全掌控制造业、运输业、商业和金融业等主要经济部门；埃及人不被接纳入苏伊士运河公司董事会；在埃及定居的外国人享有特殊地位。

1930年6月，国王福阿德一世解散纳哈斯帕夏领导的华夫托党内阁，废止1923年宪法并解散议会，颁布强化君主政治的1930年宪法，君主权力急剧膨胀。1935年12月，福阿德一世被迫恢复1923年宪法。次年4月，福阿德一世驾崩，王储法鲁克即位。

“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埃及的政治民族主义开始失去它早期的纯洁性，从而也失去了它原有的某种感召力。民族主义的主流要么同它正在抗击的帝国强权沆瀣一气，要么被敞开在他们面前的高官厚禄所折服，变得腐败起来。”¹⁵埃及政治愈发陷入党同伐异和政治报复之中，暴力化和极端化趋势明显。自20世纪40年代起，内阁更迭频繁，各党均对内实行高压政策，对外无力反抗帝国主义；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日益加深，民众游行示威频繁，以穆兄会为首的政治团体大肆发动政治暗杀，埃及处于极度混乱之中。在1948年至1949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巴勒斯坦战争）中，阿拉伯联军惨败，埃及民众普遍认为这是王权专制和官僚腐败的结果。此后直到“七月革命”，埃及政局极端混乱，政府屡次更迭，民众对宫廷和政府愈发不满，埃及处于严重的政治危机当中。

（三）“七月革命”与共和制的建立

1949年，以纳赛尔中校为首的部分少壮派军官建立了名为“自由军官组织”的秘密组织，密谋于1954年发动军事政变推翻穆罕默德·阿里王朝。据统计，该组织至1952年“革命”前，已拥有约200名成员。1952年1月27日举行的开罗军官俱乐部选举激化了宫廷与军官的矛盾，法鲁克国王于当年7月15日解散开罗军官俱乐部，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执行委员会由此认为国王已经察觉其密谋，于是决定于7月21日午夜发动军事政变。虽然由于准备不周，“自由军官”直至22日晚11时才正式发动政变，但到23日凌晨已基本控制开罗。25日，“自由军官组织”宣布废黜法鲁克国王，拥立王储艾哈迈德·福阿德即位，是为福阿德二世。

政变成功后，纳赛尔以“自由军官组织”执行委员会为基础建立革命指导委员会，作为埃及最高权力机关；同时，拥戴在军队中颇得人心的穆罕默德·纳吉布少将出任革命指导委员会主席、国防部长和武装部队总司令。9月7日，纳吉布取代阿里·马海尔帕夏成为王国首相，组建新政府，并逮捕了近百名宫廷官员和政党领袖，清洗了大批高级文官和亲宫廷的军官。施政方面，新政府颁布了较为温和的土地所有权限制法案，以期“建立起一个小所有者的新阶级”，¹⁶但遭到以宫廷和地主为首的反动势力的强烈反抗；同时，华夫脱党和穆斯林兄弟会不断要求分享政治权力，革命指导委员会被迫以释放所有政治犯、接纳部分文官和政党成员进入政府作为让步。

革命指导委员会于12月宣布废除1923年宪法；于次年1月取缔所有政党并没收财产（仅保留穆斯林兄弟会作为社会和宗教组织而存在），成立新的政治组织“解放大会”取代各政党，宣布进入为期三年的“过渡时期”，实行全国戒严，禁止一切政党活动，实施新闻检查，由革命指导委员会代行立法与行政职权，取消原定于2月的大选；于2月颁布临时宪法。6月17日，革命指导委员会宣布废除君主制；次日，埃及共和国宣告成立，纳吉布出任总统兼总理，纳赛尔任副总理兼内政部长。

随着军人政权的逐步稳定，穆斯林兄弟会愈发成为政府的威胁。1954年1月12日，穆兄会发动反对军人政权的示威，当局立即将其取缔，其组织转入地下。在政府内部，“挂名首脑”纳吉布总统和“自由军官组织”的领袖纳赛尔的冲突也日益激烈：纳吉布“要求对内阁、革命指导委员会和总司令的决定拥有否决权”而“自由军官”则“设法限制纳吉布的权力”并“有意识地把排除在决策圈之外”。¹⁷

1992年，第165-166页。

15 穆罕默德·海卡尔：《萨达特遇刺记》，发恩、黎启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143页。

16 李闻编著：《埃及》，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第70页。

17 雷钰、苏瑞林：《中东国家通史·埃及卷》，第289页。

2月23日，纳吉布总统以退为进，向革命指导委员会递交辞呈，不料革命指导委员会不仅接受了辞呈，还派军队将其软禁。这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民众在已被取缔的华夫脱党、穆斯林兄弟会和社会民主党的鼓动下发动示威游行，部分支持纳吉布的军人也集会要求恢复其职务，甚至密谋发动军事政变。3月初，革命指导委员会被迫妥协，发布了恢复纳吉布的总统职位、许诺于当年7月举行立法会议选举的“三月决议”。

然而，到3月27日，局势发生逆转：在军队、“解放大会”和部分工会和行会的支持下，纳赛尔击败了纳吉布的支持者，宣布废除“三月决议”，并着手清洗政府和军队中的反对势力。11月14日，革命指导委员会宣布解除纳吉布的总统职务，由纳赛尔代理总统职权。1956年6月23日，埃及共和国宪法经全民公决通过，纳赛尔当选总统并兼任总理。

三、以色列背景

（一）欧洲反犹狂潮与锡安主义

步入近代社会，民族主义在改变欧洲各国的政治面貌的同时，也在进一步强化各国社会中的反犹情结。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催动下，反犹运动经政治动员和大众传媒的放大效应而越发猖獗。而与反犹狂潮相对的，则是犹太人心中越发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热忱。可以说，欧洲的民族主义思想不仅影响着欧洲人，同时也影响着犹太人——在与犹太人传统“故土观念”的相互作用下，一股力量强大而影响深远的思潮产生了——犹太复国主义（又名锡安主义）。

犹太复国主义早期倡导者以摩西·赫斯（Moses Hess）为代表。他在1862年出版的《罗马与耶路撒冷》中表示，犹太群体的特质是难以被摧毁的，这是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标识。在这个意义上，犹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民族问题——只有犹太人返回“应许之地”巴勒斯坦重建古老的犹太国家，犹太人才能摆脱反犹主义，真正迎来民族的解放。

与摩西·赫斯同时代的列奥·平斯克（Leon Pinsker）也萌生了重建犹太国家的想法，并较前者更进一步。他在《自我解放》中不仅提出了建立犹太人的民族国家的想法，而且设计了一些具有一定可行性的具体方案。他的思想在俄罗斯反犹狂潮中得到了许多俄国犹太人的响应，甚至已经有一些人向巴勒斯坦移民，但不成熟的计划与艰苦的环境，让这些尝试都以破产告终。

1894年，一名已经皈依基督教的犹太炮兵上尉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被控向德国泄露军事机密，法国军事法庭随即以叛国罪判处其终身监禁，史称“德雷福斯事件”。该事件被曝光后震惊全法，并掀起了一股要求惩处并驱逐所有在法犹太人的群众运动。而亲身经历该事件的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彻底对“同化”策略失望，并开始独立构想建立犹太民族国家的计划。

1896年，他出版了《犹太国》一书，对犹太问题的根源、犹太自决的理由、犹太建国的方略等问题都作出了回答。他认为犹太人问题的根本是一个民族问题，犹太人应该像其他民族一样拥有属于自己的国家；犹太教相信等到救世主弥赛亚降临时，所有犹太人都会生活在“应许之地”迦南，但与其消极地等待，犹太人更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回到巴勒斯坦，在这片他们先辈曾生活过的土地上用自己的双手重建犹太国以色列。这不仅是一种历史权利，更是一种历史义务——每一位犹太人都应该如此。

《犹太国》的出版引发了轰动，赫茨尔也将自己投身于这场复国运动之中。他于1897年在巴塞尔联系并组织了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First Zionist Congress），在会上建立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并担任主席。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成立，标志着犹太复国主义也从早期的社会实验性质向国际性的政治运动转变，日渐成熟。

大会在确定复国运动路线上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巨大分歧。一些人认为，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居并建立犹太国家，必须得到大国的同意和支持，这些人被称为政治派；另一些人则认为向巴勒斯坦移民是犹太人的历史权利，应该尽快展开移民活动，以期达成既成事实，他们

也被称为行动派。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但大会还是通过了《巴塞尔纲领》，规定“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争取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得到公认、有法律保障的家园。”¹⁸

（二）20 世纪犹太复国运动的曲折发展

自 1896 年第一次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之后，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发展迅速，到 1901 年第五届大会召开时，“出席代表数达到 600 名，代表着世界各地的 1572 个犹太复国主义小组和整个运动登记在册的十万余名成员。”¹⁹ 两派都取得了成果。

1. 政治派：英国的支持和《贝尔福宣言》

作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的赫茨尔本人是希望获得大国认可和支持的政治派。在大会召开后不久，赫茨尔便多次拜会各国政要，以期获得他们的支持。但是面对犹太人独立建国的请求，无论是境内有众多犹太人口的德国，还是控制着巴勒斯坦地区奥斯曼帝国，均反应冷淡；无奈之下，赫茨尔等人将希望转向反犹程度较轻的英国。

英国政府起初对复国运动者也是持暧昧态度，但随着欧洲反犹活动愈演愈烈，大量犹太人渡海前往英国及英属殖民地避难，再加上英国本土犹太社团的暗中影响，英国开始考虑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合作，以解决原来越严重的犹太难民危机。因此，赫茨尔和其他政治派高层将争取英国的支持列为首要工作目标。

但英国出于战略利益并不希望将巴勒斯坦作为犹太家园的地点。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曾提议将东非英属乌干达地区作为犹太难民的临时安置地，但这一方案在 1905 年的大会上遭到否决，多数犹太人认为巴勒斯坦才是建立“犹太家园”的唯一选择。乌干达方案的失败及赫茨尔的逝世打击了政治派的威望。

1914 年一战的爆发不仅是近代历史的重要时间节点，也是犹太复国运动的重要转折点。战争末期，随着同盟国的节节败退和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在中东地区留下了巨大的政治真空，犹太复国主义者抓住时机，展开了新一轮的政治攻势，并得到了想要在中东扩展势力的英国支持。

1917 年，英国出兵占领巴勒斯坦。随即，在征求了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意见之后，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于当年 11 月 2 日代表英国政府发表了著名的《贝尔福宣言》。宣言直言英国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民建立一个民族家园，并将为这一目标的实现尽最大的努力。”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召开 20 年之后，犹太人的复国运动得到了第一个大国的正式支持。

1919 年，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积极推动和英、美两国“护法”的情况下，巴黎和会确认了《贝尔福宣言》的基本原则。而根据战时英法在 1916 年秘密达成的《赛克斯—皮克协定》，法国和英国瓜分了奥斯曼帝国留下的遗产，巴勒斯坦进入了英国委任统治时代。

英国在巴勒斯坦的统治并非一帆风顺。由于越来越多犹太人的迁入，移民与当地阿拉伯人在土地、文化、宗教上的复杂矛盾刺激着冲突不断升级。而英国人违背战时“建立一个阿拉伯国”承诺转而与法国瓜分中东的行为更是引起了阿拉伯人的普遍不满。《贝尔福宣言》的公布，令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深感愤怒，他们不仅拒绝承认宣言内容，还多次举行游行，甚至展开了对犹太定居点的攻击。

1921 年 5 月，雅法爆发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大规模冲突。1929 年，双方为了争夺“哭墙”在耶路撒冷爆发的冲突很快在巴勒斯坦全境蔓延，英国当局被迫出动军队镇压。1936 年，巴勒斯坦爆发了阿拉伯人大起义，阿拉伯人开始联合在一起，有组织地开展反英、反犹斗争。

面对阿拉伯人掀起的反抗浪潮，英国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开始有意限制犹太人继续进入巴勒斯坦（1922 年丘吉尔白皮书），调整了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态度，并首次提出“要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利益提供保证”（1930 年帕斯菲尔德白皮书），试图调和双方的矛盾。但当阿拉伯人意识到所谓的“犹太家园”不过是“犹太国家”的遮羞布时，当犹太人意识到复国希望不能全部指望英国人之时，仇恨的引线已经埋下。

¹⁸ 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巴勒斯坦问题参考资料》，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 年，第 1 页。

¹⁹ 肖宪：《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商务印书馆，2001 年，第 61 页。

2. 行动派：五次阿里亚和“犹太民族家园”的建设

事实上，欧洲犹太人自发向巴勒斯坦移民的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 1882 年。在希伯来语中，这场移居又被称为“阿里亚”，意为“上升”，就是说当犹太人到圣地定居后，其精神肉体都得到了升华。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建立的犹太民族基金和犹太垦殖银行不断帮助移民在巴勒斯坦从事农业生产。

犹太移民数量的增长使得巴勒斯坦地区出现了许多新兴的聚落，这些据点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犹太社团伊休夫（Yishuv）。为了加强对移民和伊休夫事务的管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于 1908 年决定在巴勒斯坦雅法港设立了专门的办事处。一批犹太城市在这之后得到快速发展，如原先只作为雅法卫星城的特拉维夫。1909 年，犹太移民建立了特拉维夫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伊休夫已经出现了一批工厂企业，公共教育事业也有了发展，甚至出现了一些早期的犹太政党。

一战结束后，英国开始委任统治巴勒斯坦。中断许久的移民进程再度开始，第三次和第四次阿里亚运动先后兴起。鉴于这时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大多是破产者和难民，无力自己购置土地，1920 年负责资助困难移民的“巴勒斯坦殖拓基金”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推动下应运而生。同年伊休夫的代表机构巴勒斯坦犹太民族委员会建立，负责处理犹太社团的日常事务，并得到英国当局的承认，犹太自治制度逐渐建立起来。

1929 年，为了进一步团结世界各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非犹太复国主义者，争取他们对于新生的巴勒斯坦伊休夫的支持，第 16 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决定设立巴勒斯坦犹太办事处。从 1929 年到 1948 年，它在巴勒斯坦犹太社团的各项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履行了实际上的“准犹太政府”的职能。

1933 年之后，随着纳粹政权在欧洲各国的上台，许多犹太人离开欧洲前往巴勒斯坦，形成了第五次阿里亚运动。这次移民规模空前，超过了前四次的总和。到 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达到了 45 万，占地区总人口的 1/3，一个“美好的犹太家园”已经初具规模。

（三）犹太家园的巩固与犹太民族国家的建立

随着犹太人口的上升，危机感加深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冲突不断升级。为了应对阿拉伯人的威胁，伊休夫开始加强防务力量。一战结束后，犹太人在民兵组织的基础上建立了防务队，1920 年，劳工联盟建立了自己的地下军事组织“哈加纳”，目的是给计划中的国防军队的建立做准备；1931 年，一些激进的哈加纳成员脱离组织，建立了哈加纳 B 派，随后又改名为“伊尔贡”，参与了许多针对阿拉伯人的报复行动。

面对不断恶化的局势，英国当局首先提出了一个分治方案：其主旨是将巴勒斯坦一分为三，一部分与外约旦一起成立阿拉伯国，一部分成立犹太国，雅法港和耶路撒冷地区则组成一个英国管理区。但这个犹太人勉强同意的方案遭到了来自阿拉伯人的强烈反对，1937 年的泛阿拉伯大会更是集体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关于废除委任统治、建立阿拉伯国的诉求。

英国在放弃分治方案后，得出了阿—犹冲突不可调和的结论。而轴心国在欧洲的威胁，更是令英国无力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为了平息阿拉伯人的愤怒，1939 年 5 月英国单方面发表《麦克唐纳白皮书》，宣称：“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绝非为了让巴勒斯坦成为一个犹太国家”，²⁰因为这忽视了在当地占多数的阿拉伯人；“未来的巴勒斯坦国应是由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共同组成政府，以同时保护双方的主要利益”。²¹

白皮书的发布标志着英国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合作的终结，但同时也极大动摇了英国委任统治的根基：犹太人将英国的行为视作对《贝尔福宣言》的背叛，认为这剥夺了其“重返故土”的自然权利，但犹太人绝不会屈服；阿拉伯人则将其视为斗争的阶段性的胜利，在继续反抗的同时开始描绘未来独立的巴勒斯坦的蓝图。

²⁰ 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巴勒斯坦问题参考资料》，第 14 页。

²¹ 同上，第 17 页。

二战爆发让脆弱的巴勒斯坦局势出现了降温局势。尽管英国在政策上已经转向“扶阿抑犹”，但是犹太代办处认为战争中犹太人最大的威胁依然是法西斯，必须与英国一道共克难关。“犹太代办处一面同英国通力合作，一面又致力于组织自己的地下力量，并赞助一项系统实施的政策，通过偷盗和贿赂从英国在中东的军事仓库中取得武器弹药，发展自己的军事组织，不断增强军事力量，为之后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准备。”²²

1942年，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美国举行会议并通过了《比尔特摩尔纲领》，纲领否认《麦克唐纳白皮书》的合理性，重申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的主张，引起了美国激进犹太群体的广泛共鸣。在这些人的积极游说下，本就希望参与中东事务的美国开始逐步成为犹太复国主义新的支持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重创了英国，其殖民地分离倾向加剧，民族独立运动高涨，使得其无力继续维持在中东地区的统治。犹太复国主义者尽管认为这是建国的最佳窗口期，但也认识到建立一个完整的巴勒斯坦犹太国不现实。为此，犹太代办处提出了“犹阿分治”方案，即在巴勒斯坦地区同时建立两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为了分治方案得到更多支持，犹太人发起了一场猛烈的政治与外交攻势。

一是利用在欧洲犹太大屠杀中的受害者形象，争取国际同情与支持。英国在战后深感美国和苏联力量扩张的压力，意识到其在中东的地位正在被不断削弱。为了保持在中东的影响力，英国加强了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并推动阿拉伯力量的联合抵制犹太复国运动的发展。对此，犹太人则不断渲染民族悲惨命运以及在巴勒斯坦建立新家园所付出的努力，与其欧美支持者在国际舆论上与英国和阿拉伯国家同盟针锋相对。

二是不惜激化英犹矛盾，逼迫英国让步。英国本想继续维持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拒绝将巴勒斯坦问题提请即将成立的联合国审议，但在犹太地下武装发动“希伯来抵抗运动”并开始使用恐怖袭击手段表达抗议、犹阿冲突再度升级的情况下，英国求助于美国合作组建委员会制定新的解决方案。

三是拉拢美国，孤立英国，以参与中东事务为诱饵分化英美同盟。英国主张在巴勒斯坦地区保留中央政府的前提下“分省分治”，原则上依旧是一国方案，而这是渴望建国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无法接受的。在美国犹太群体的积极游说下，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同年10月转而宣布支持“犹阿分治”方案。这标志着英国外交斡旋的基本破产，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英美同盟被拆散。

四是利用联合国机制，推动分治方案的通过。1947年，深感无力的英国最终放弃独自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转而将其提请新成立的联合国审议。联合国大会在派出了“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进行调查之后，收到了来自委员会成员的两份方案：多数派方案提出巴勒斯坦实行分治，在结束委任统治之后经过两年的过渡期，同时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和一个阿拉伯人国家，耶路撒冷实行国际托管；少数派则主张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由犹太实体与阿拉伯实体共同组成的邦联国家。为了保证多数派方案能够通过，犹太人派出了一支外交队伍积极游说各国，取得很大成果。而多数派方案在美国推动、苏联认可、英国保持沉默、其它同情犹太人遭遇国家支持的有利条件下，在1947年11月29日的表决中以33国赞成，13国反对，10国弃权的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根据这份关于“巴勒斯坦将来治理问题”的联合国181号决议，历尽磨难的犹太人终于得以建立起自己民族的国家——以色列。

（四）犹阿冲突与第一次中东战争

以色列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和平的到来，相反，在联合国对巴勒斯坦问题进行讨论的时候，阿拉伯国家就已经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态度。阿拉伯代表在发言中声称，阿拉伯人对于巴勒斯坦的主权无可争辩。任何侵犯其主权的解放方案都不会得到阿拉伯国家的认可，甚至有可能引发战争。

1948年5月14日，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结束。同日，犹太复国主义者正式宣布建立犹太国以色列，犹太民族委员会被指定为国家的临时议会，执行委员会则成为临时政府，

²² 李凯：《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在以色列建国中的作用》，硕士论文，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2013年05月，第48页。

由本·古里安担任临时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次日，埃及、伊拉克、外约旦、叙利亚以及黎巴嫩纷纷宣布发动圣战，派军队进入巴勒斯坦，以色列军随即反击，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

战争初期，阿拉伯人占据主动。5月22日埃及远征军已抵达耶路撒冷南部，展开对圣城的攻势。5月28日，耶路撒冷旧城在外约旦军队的进攻下投降，新城岌岌可危。北部叙利亚伊拉克联军也快速挺进，抵达了距地中海仅10英里的图勒卡姆，几乎切断以色列的交通。到6月11日时，埃及军队已经占领了加沙、比尔谢巴、内格夫1/3以上的土地，并完成了对特拉维夫的包围。

鉴于局势危机，以色列盟友美国推动安理会通过了停火决议。停火从6月11日起生效，接近亡国的以色列开始全民动员，在美国和苏联的帮助下暗中恢复军队力量。到7月9日以色列再次发动进攻时，军队数量已经超过阿拉伯联军4.5万人，而且装备先进，士气高昂。

战争的第二阶段，以色列发动了“十天进攻”，不仅快速收复了诸多失地，而且利用阿拉伯联军指挥分散组织混乱的弱点逐个击破，向北占领加利利地区，在7月11日、12日于中线相继收复被外约旦“阿拉伯军团”控制的卢德与腊姆拉两城，打开了前往耶路撒冷的通道。到7月18日，联合国第二次停火协议生效，战争的天平开始向以色列倾斜。

面对以色列的反攻，阿拉伯联军方面显得力不从心。自开战伊始，阿拉伯军队内部就围绕着最高指挥权展开了斗争。名义上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是联军的统帅，但为限制其权力，其他国家又推举阿拉伯地区昔日的英雄考克吉为志愿军的总指挥，从而造成多头指挥的局面。²³ 联盟内部的斗争极大地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10月15日，以色列再度破坏停火协议，集中兵力进攻南部的埃及军队。面对入侵，许多阿盟成员却选择了按兵不动。在多场战役中失利的埃及不得不在1949年1月7日寻求停战。

随着以色列与埃及、叙利亚、外约旦等国签订停战协议，以色列同这些国家重新划分了边界与控制线，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通过协议，以色列控制了巴勒斯坦4/5的土地，并驱逐了约6万巴勒斯坦人，巩固了作为犹太民族国家的基础。而加沙地带与约旦河西岸土地则分别被埃及和外约旦控制或并吞，巴勒斯坦的建国进程被打断。尽管第一次中东战争后，中东地区出现了短暂的和平局面，但实际上这却是近代阿以问题的导火索与开端。战争过后阿以双方都死伤惨重：以色列阵亡6000人，伤1万5人；阿拉伯联盟国家军队亡1万5人，伤2万5人。²⁴ 而由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地区的侵占，原本生活在此的数以万计的巴勒斯坦人被迫流亡成为难民，为日后阿以持续不断的冲突埋下了祸根。

23 汪树民：《阿拉伯国家的内部冲突与第一次中东战争的失败》，《历史研究》，2002年第10期，第27页。

24 张婷婷等编著：《世界通史》，吉林出版集团，2015年，99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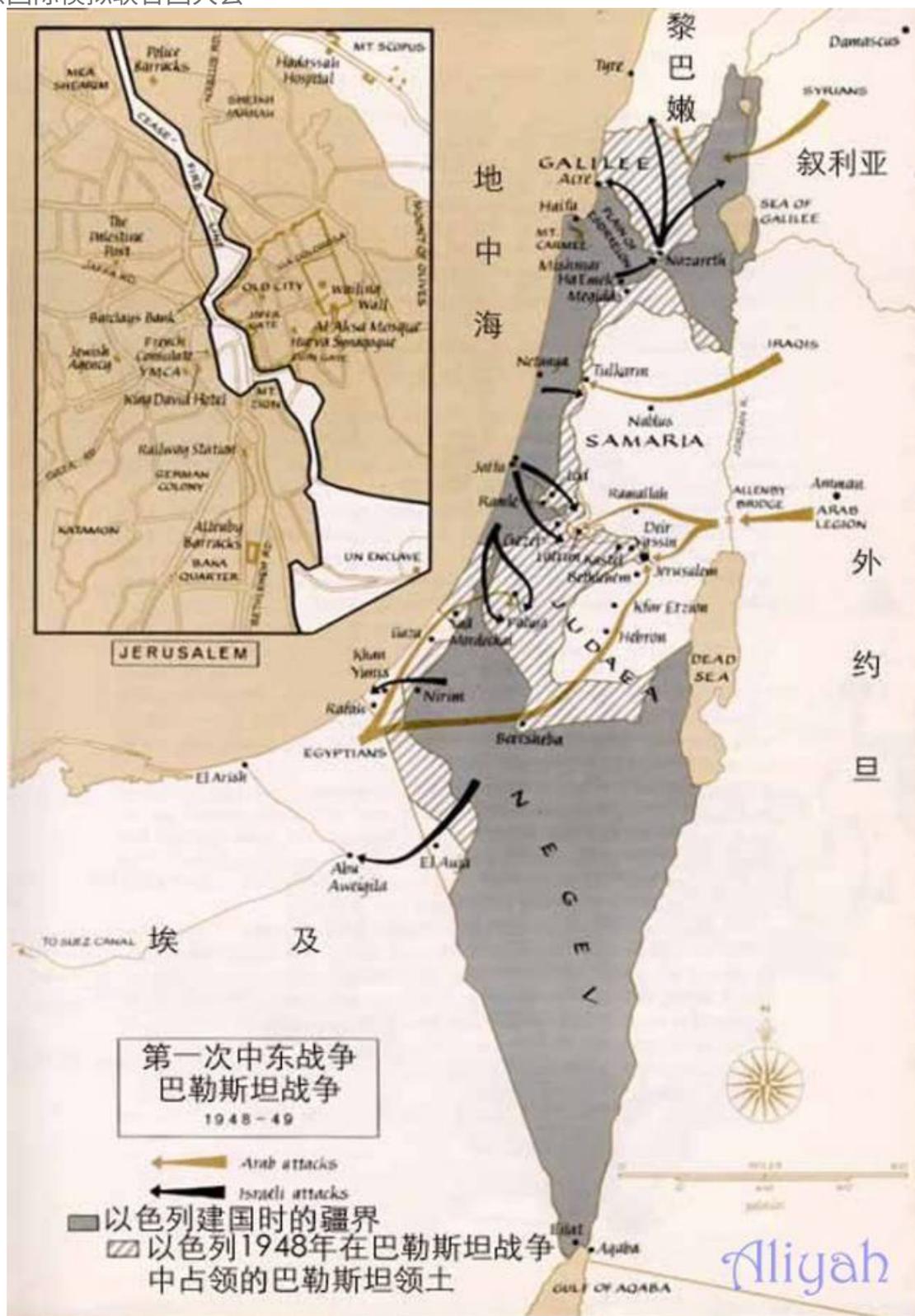


图 3：第一次中东战争示意图²⁵

25 第一次中东战争示意图, https://www.sohu.com/a/234139775_389790, 2020年2月17日登录。

四、苏伊士运河相关历史

苏伊士运河地处亚非两大洲交界处，沟通了地中海与红海，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早在古埃及时期，就有法老推动在苏伊土地峡开凿运河，并将之命名为“法老运河”，令人可惜的是，在公元 8 世纪该运河就完全毁弃了。

17 世纪中叶至 19 世纪中叶，随着英法之间矛盾的不断加深，双方对苏伊士地区愈发重视，围绕苏伊士运河的修建展开了激烈的交锋。自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起，英国逐步建立起海上霸权，并最终掌控了好望角航路。在苏伊士运河尚未开通之时，好望角称得上是欧亚两大洲船舶来往的必经之地，其战略地位不容小觑。对于法国而言，原先通过好望角的航线路途遥远，自身也难以在好望角航路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再加上法国认为其传统商业利益集中于地中海等诸多考虑，法国需要一条路途较近、便于法国控制的航线，因此开通苏伊士运河，符合法国的需要。

法国开通苏伊士运河的想法由来已久，在拿破仑远征埃及时，他的其中一个任务便是开通苏伊士运河。但当时由于种种原因，这个任务并未完成。1846 年，由法国圣西门会成员领导的苏伊士运河研究会成立，希望通过开凿苏伊士运河恢复埃及在东西方贸易中的有利地位。英国意识到苏伊士运河研究会法国色彩强烈，代表的是法国的利益，因此提出了修建铁路的计划与苏伊士运河研究会相抗争。双方均与穆罕默德·阿里帕夏交涉，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与同意。然而穆罕默德·阿里帕夏为维持埃及的独立，对两方的计划均不同意，并以一方的支持为依仗去反对另一方的计划。直到穆罕默德·阿里帕夏退位，双方的计划均未被批准。后一任帕夏阿拔斯帕夏具有亲英倾向，为了取得英国的支持，很快同意了英国提出的修建铁路要求。尽管为了照顾法国的情绪，阿拔斯帕夏主张将铁路分成两段修建，但法国对此依然不满，甚至认为埃及可能将被英国掌控。

后来，亲法的赛义德帕夏的上台，给法国人开通苏伊士运河创造了机会。1854 年，出身于法国外交家族的莱塞普，儿时与赛义德有较良好的关系，前往游说赛义德帕夏。他给赛义德帕夏描述了运河修建后的美好图景，说服了赛义德帕夏开通苏伊士运河，并拿到了运河的开凿权。由此第一份开凿运河租让合同诞生，合同主要包括授予莱塞普成立运河公司、开凿苏伊士运河的权力，无偿割让给运河公司开凿运河所需要的土地等 12 项条款。²⁶

法国开凿苏伊士运河势必将影响英国已经控制着的欧洲 - 好望角 - 印度航线，如果日后来自英属印度的货品都必须从被法国所控制着的苏伊士运河通过，那对于英国而言将是一场灾难。出于担心法国借运河挑战英国在亚非等殖民地霸权的考虑，英国反对修建苏伊士运河。此时的奥斯曼土耳其政府夹在英法之间，希望两不得罪。为了能继续拖延批准，又不得罪英法两国，奥斯曼土耳其政府认为应在欧洲列强取得共识的前提下批准该合同。在土耳其的提议下，英法进行接触，英国认为开通此运河会对英法两国关系造成不利影响，法国则以开通苏伊士运河为莱塞普私人商业运作为由，主张英法两国政府都不要进一步干涉这一行动。于是，莱塞普多次前往英国进行游说，希望能说服英国同意开通苏伊士运河。1856 年，在与英国接触的同时，莱塞普与赛义德帕夏签订了运河的第二个租让合同（共 23 项条款。肯定第一个租让合同并扩展原有合同的权利，特别提出埃及提供开凿运河所需劳动力的 4/5）。这个合同还保留了土耳其苏丹的批准生效权。²⁷

综合各种考量，奥斯曼土耳其政府迟迟未能批准该合同。而莱塞普尽管在新合同签订后又做出了种种努力，却均无明显成效，于是他决定成立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发售股票，筹集资金。之后，苏伊士运河开凿工程便在奥斯曼土耳其政府尚未同意时开工。

后来，随着法奥战争的结束，法国对英国的顾虑有所减少，开始公开支持苏伊士运河的开凿。此时的英国还是不愿同意苏伊士运河的开凿，依然持反对态度。但是，赛义德帕夏以及随后继任的伊斯梅尔帕夏大力支持苏伊士运河的开凿，伊斯梅尔帕夏甚至曾成为运河公司最大的股东。²⁸随着时间的推移，苏伊士运河的开凿进度超出了英国的预料，英国内部也有声音认为，英国不应该反对苏伊士运河的开凿，而应该反对法国单独控制苏伊士运河。

26 赵军秀：《评英法开凿苏伊士运河的矛盾》，《世界历史》，1994 年第 4 期，第 28-35 页。

27 赵军秀：《评英法开凿苏伊士运河的矛盾》，第 28-35 页。

28 同上。

随后，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开凿一事上的态度逐渐转变，英国逐渐涉入对苏伊士运河的开凿。英国认为，奥斯曼土耳其政府应该有条件地批准合同。奥斯曼土耳其在英国的授意下向英法两国提出了条件，英法两国又以此为基础展开了争执。最终，在英法的默认下，埃及与运河公司达成了协议。运河公司同意废除劳工法令；公司只保留运河工程所需的土地，放弃多余的 6 万公顷土地；埃及支付 8400 万法郎给运河公司，作为更改租让合同的赔偿。1866 年 3 月 19 日，土耳其苏丹发布敕令，批准 10 年前的运河租让合同，承认 7 年前的“既成事实”，至此，运河开凿获得了合法地位。1869 年 11 月，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²⁹ 苏伊士运河的成功开凿，是法国多年以来推动的，从这个角度看，是法国取得了胜利。但从运河通航第二年的船只及货物通过情况来看，英国却是最大的赢家。

1875 年，英国买进了伊斯梅尔政府为支付债务而出售的苏伊士运河的股票，自此英国在运河公司占据了重要地位。鉴于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后对英国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对英国来说，当然希望将其掌握在自己手里。1882 年，英国强行霸占埃及和苏伊士运河区。尽管由于苏伊士运河关系到诸多列强的利益，英国无法完全独占运河，但英国依然凭借运河获取了大量利益。

1888 年 10 月 29 日，英国、德国、奥匈帝国、西班牙、法国、意大利、荷兰、俄罗斯和土耳其在君士坦丁堡签订了一份有关苏伊士运河通航规则的文件，史称《君士坦丁堡公约》，这是一部有关允许各国在苏伊士运河上自由通航的国际条约。条约主要强调，无论是战时还是平时，苏伊士海上运河对所有商船或军舰自由开放，永远不能封锁运河（即使土耳其是交战国）。同时公约还规定，在战争时期交战国不得在运河区将其军队，弹药或战争物资装船或卸载。

1936 年，在英国的要求下，埃及政府与之签订了《英埃友好与同盟条约》，使英国有权在苏伊士运河地区驻军 20 年。1951 年，为了维护埃及的主权完整，埃及在与英国修订条约无果的情况下，单方面撕毁了该条约。这引起了英国的不满和反对，结果引发了埃及人民的反抗行动。最终，英国转向与埃及谈判，受到了埃及新政府的欢迎。但是，谈判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几经周折，最后在 1954 年 10 月 19 日，英埃双方签订了《苏伊士运河基地协定》，埃及以保留英军对运河区军事设备的监督权换来了英方的撤军，最终英军于 1956 年 6 月 13 日全部撤出苏伊士运河地区，但由于埃及独立后政权尚未巩固，其之后将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的行为招致了英法两国的强烈反对，为第二次中东战争埋下了伏笔。

29 赵军秀：《评英法开凿苏伊士运河的矛盾》，第 28-35 页。

苏伊士运河危机

一、苏伊士运河危机始末

(一) 导火索：苏伊士运河国有化

1. 日落塞得港：英军撤出运河区（1954-1956）

“两缔约国承认，苏伊士运河作为埃及不可或缺之部分，是一条在经济、商贸和战略领域具有国际重要性的水道；并表示，两国决心维护于 1888 年 10 月 29 日在君士坦丁堡签署的运河自由航行保障公约。”

——苏伊士运河基地协定（第八条），1954 年 10 月 19 日³⁰

1952 年革命后，年轻的埃及共和国内部政治斗争仍未平息，最高政权数度易手，风波不断。与此同时，埃及并未放弃一个世纪以来坚持的兼并苏丹、建立尼罗河联邦的主张，而这遭到了英国支持的苏丹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围绕苏丹主权独立的问题，英埃关系持续紧张，埃及谋求的结束英军对运河区占领、实现埃及完全独立的问题无从谈起。僵局在 1953 年迎来转机，埃及同意在三年过渡期后与英国一道从苏丹撤军，结束对苏丹的“共管”。

苏丹问题的解决缓和了英埃之间紧张的氛围，为纳赛尔提供了收回运河区的机会。1953 年 4 月，两国在开罗开启谈判。埃及主动表示，允许一定数量的英国技术人员留驻运河基地，以确保基地在战时重新启用，前提是英国不要以此作为占领埃及的借口。英方的要求大大超出埃及的底线，他们希望保留七千名着军装的技术人员，继续保留对基地的军事指挥权。埃及方面对此极为不满，在 5 月 6 日中断会谈，并持续对英国政府施压。埃及方面将原本分散的反英游击队组建成统一的“民族解放民兵组织”，并指派一千二百名军官对其进行训练，还为他们提供了大量武器。为了结束英国殖民统治，并削弱其在中东的主导地位，美国也极力劝说英军撤出。³¹

此时的英国虽然明面上仍然持强硬态度，但也着手准备调整军事部署以应对形势变化。1953 年 12 月，英国决定将中东地区的军事力量指挥部从苏伊士运河区迁到塞浦路斯。

1954 年 1 月，英埃会谈重启。埃及做出重大让步，接受了此前严词拒绝的条件，允许运河基地在土耳其遭受攻击的前提下被重新启用，然而英方仍拒绝接受全面撤军的要求。直到民族解放民兵组织对运河区发动全面进攻，英国才被迫接受条件，撤出在埃及的所有武装人员，以英国公司和埃及签约的形式，留下维持基地的文职人员。1953 年 10 月 19 日，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ony Eden）同纳赛尔正式签署撤军协定。

协定中明确了撤军的具体步骤和后续运河基地的归属。该协定正式废除了 1936 年英埃条约；规定以 20 个月为期限，英军自埃及分批次完全撤出；运河基地的现存设施交还埃及控制，并由一千二百名英国文职技术人员协助维持使用；同时，埃及不得违反运河自由之航行公约。该协定的有效期为七年，在此期间，苏伊士运河基地的部分设施应当维持工作，以满足紧急需要。协定规定了英军重返基地的条件，即外部力量对土耳其和阿拉伯共同防御条约国家³²的袭击。

英国于 1956 年 6 月 13 日撤出在埃及的最后一批军队。至此，英国对运河区长达 74 年的军事占领正式终结。³³

30 Anthony Gorst and Lewis Johnman, *The Suez Crisis*, Routledge, 1997, p. 33.

31 雷钰、苏瑞林：《中东国家通史：埃及卷》，第 291-292 页。

32 即 1950 年缔约的埃及、沙特阿拉伯、约旦、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也门和利比亚八国。

33 雷钰、苏瑞林：《中东国家通史：埃及卷》，第 292-293 页。

2. 波起阿斯旺：贷款计划夭折和运河国有化（1955-1956）

“四年来，我们感觉自己已经变得更加坚强勇敢。在 7 月 26 日，四年前推翻国王的那天，也就是我们将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的那一天。至此，我们实现了自己的部分愿望，并开始建设一个健康而强大的国家。

除了埃及人民的主权外，埃及没有其他形式的主权。**埃及人民在祖国工业化建设的道路上奋进，坚决抵抗任何侵略者和帝国主义阴谋。我们还将实现我们大部分的愿景，并将高效地建设祖国，因为不再有人干预我们的事务。今天，我们是自由和独立的！”**

——纳赛尔，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讲话，1956 年 7 月 26 日³⁴

革命后的埃及政府也急于改变国家经济落后的局面，决定在上埃及阿斯旺（Aswan）附近的尼罗河峡谷间修筑一项规模浩大的水利工程，包括一座高坝、一个大型水库（纳赛尔人工湖）和水力发电站。该工程的投资总额约需 13 亿美元，其中 9 亿美元的金額用埃镑支付，用于开支本国劳工的薪水、尼罗河河床改造、大坝主体以及交通运输等费用，其余 4 亿美元的资金则需用外汇支付，以购买有关机械设备、发电涡轮机设备及支付与埃及合作的外国工程技术专家的工资等费用。工程预计在 15 年内，分两个阶段完成。³⁵

埃及实现其宏图伟业的最大困难在于资金不足。埃及政府手中持有的外汇有限，而本国货币在投资总额中占比庞大，政府无力承担巨额财政支出，而若超发货币则会带来严重通货膨胀。埃及政府于是在 1953 年开始争取国际资金支持，很快，世界银行的美国籍官员尤金·R·布莱克（Eugene R. Black）也通过其研究证明了支持埃及的计划的积极效应。美国政府的态度起初十分暧昧，并一度将其看作为英国制造行业和建设行业牟利的贪婪手段；但最终还是迫于中东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加入援助谈判。埃及财长率团和英国大使及世界银行代表于 1955 年 11 月 21 日至 12 月 16 日在华盛顿展开谈判，初步达成了首轮工程的资金协议，³⁶ 确定英国承担 1400 万美元，美国承担 5600 万美元，以赠款或兑付债券的形式，帮助埃方解决总额 7000 万美元的工程款项。这笔两国共担的资金主要供埃及进口更多的消费品在国内销售，回笼的货币（埃镑）作为工程的部分资金。同时，以两国履约为前提，世界银行将以长期贷款的形式提供第一期工程所需 2 亿美元。双方还决定继续谈判，商讨第二轮工程资金有关事宜。³⁷ 但是，这一援助计划在美国国会范围内公开后，受到了南部产棉州的议员和亲以游说团体的强烈反对。³⁸

随着谈判的持续进行，埃及同西方阵营的关系在 1956 年上半年急剧恶化。由于阻挠英国扩大《巴格达条约》缔约国集团，纳赛尔同艾登首相交恶，后者直言“这个‘埃及独裁者’必须铲除”；埃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苏联援助并同意对苏开展全面合作的外交活动又刺痛了美国，使美国认定埃及已经投向共产主义阵营。于是，英美决心联手让阿斯旺贷款计划“凋萎在藤上”。7 月 19 日，美国以埃及未同有关国家达成尼罗河水量分配协议和不具备修建大坝的经济实力为由，撤销对埃赠款；英国紧随其后，在次日撤销赠款；四天后，世界银行的贷款也因此一笔勾销。³⁹

7 月 22 日，纳赛尔召集财政部、贸易部和内政部官员开始为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进行三项准备工作：1) 估算运河公司股票总额及埃方赔偿金额，预估 2500 万英镑（实际斡旋后定位 2800 万英镑）；2) 起草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的法案草案，规定外国工作人员在颁布法案后不得擅自离职；3) 迅速安排必要的外汇储备，以应对国有化决定公开后西方国家采取的

34 Gamal Abdel Nasser, "Discours de Gamal Abdel Nasser (Alexandrie, 26 juillet 1956)." in Notes et études documentaires. Paris: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20-08-1956. Documents relatifs au Canal de Suez, n° 2206, p. 16-21., <https://www.cvce.eu/s/3a>.

35 欧曼编译：《收复苏伊士运河前前后后——埃及前经济财政部长谈内幕》，《阿拉伯世界》，1986 年第 3 期，第 84 页。

36 Ritchie Owendale, *The Origins of the Arab-Israeli Wars*, p. 162.

37 欧曼编译：《收复苏伊士运河前前后后——埃及前经济财政部长谈内幕》，第 85 页。

38 于英红：《艾森豪威尔处理苏伊士运河战争危机的经验及其对奥巴马政府的启示》，《西亚非洲》，2012 年第三期，第 116 页。

39 雷钰、苏瑞林：《中东国家通史：埃及卷》，第 294 页。

经济封锁。最终，埃及成功兑付了四百万英镑，另外持有总值一千万美元的证券，未能成功支取现金。

7月26日，纳赛尔在亚历山大港发表了纪念七月革命四周年的演讲。他详述了大坝贷款的谈判过程，抨击这是阻碍埃及经济独立的阴谋，以惩罚埃及拒绝支持西方军事集团的决定。埃及政府将利用经营运河的收入，自己建设高坝。⁴⁰他随后宣读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法令；当晚，运河公司便被政府正式接管。此前，苏伊士运河公司预付三年工资，辞退了公司中165名非埃及海员。英、美、法等国对随即埃及实行经济封锁，冻结埃及在其国内的所有资产（英国持有埃及1.3亿英镑存款，美国持有2700万美元埃及存款）⁴¹，禁止埃及商品进入本国市场（这使得作为埃及主要出口商品的棉花在三个月内无处可销）。埃及中央银行仅仅依靠四百万英镑支付进口商品。随后，纳赛尔政府又开始将控制埃及经济的外国银行和保险公司等逐一收归国有，并接管了所有贸易、工业和房地产等外国公司的资产。

埃及政府转而派代表赴苏联谈判，最终就大坝集资建设计划同苏联达成协议，其利率低于此前计划，本息使用埃及商品抵付，但援助并不包括帮助政府在国内进行本币筹资。⁴²

（二）外交风波

3. 朔风凛冽：冷战在中东扩展

“埃及作为一个中立国，比作为一个共产主义卫星国，更能让人容忍些。”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围绕阿斯旺高坝贷款，英美两国“出尔反尔”的举动，与当时风云变化的世界格局密不可分。而苏伊士运河危机，归根结底，是两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格局变迁过程中诸矛盾的“集中爆发”，是世界秩序由英法主导转向由美苏主导、各国争夺中东“中间地带”的过程中，不同集团利益冲突叠加的结果。因此，在分析经济纠纷滑向战争边缘的具体过程之前，有必要总体回顾当时西方阵营内部（特别是英法两国与美国之间）、以及美欧诸国同苏联在中东地区复杂的博弈。

纳赛尔革命成功后，不仅在争取本民族独立的问题上激情洋溢，还立志发动广大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的反殖反帝斗争，包括支持东非的“茅茅”（Mau Mau）运动，反抗英国在非洲的统治。英国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实力衰弱，在中东的控制力大不如前，不得不借助美国力量抵御新兴民族主义运动，勉强维持“帝国伟业”。而美国一边，中东则是其遏制苏联的战略大网中的重要节点。当时，美国已经在苏联势力范围的东西两头分别构建了东南亚条约组织—日本—韩国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两条“盟友防线”，只剩下苏联南部的“真空区域”——西亚和非洲。

英美考虑的第一个方案是英国主张的以苏伊士为中心的中东防御组织，即联合土耳其、巴基斯坦和埃及，共同抵御苏联。由于埃及的拒绝，该计划破产，美国随后提出“北层联盟”（Northern Tier）取代之，即由土耳其、伊拉克和巴基斯坦构建的穆斯林国家联盟，这一计划自1955年2月的土伊《互助合作条约》（又称：“巴格达条约”，Baghdad Pact）签订起正式落地。然而，这一条约一方面由于离间阿拉伯国家关系而遭到纳赛尔反对，另一方面又因为拉拢伊拉克而遭受后者宿敌以色列的不满，还因为巴基斯坦的缘故，使英国不得不担心对印度关系。与此同时，英国被推向中东冲突的前台，其影响力被隐身幕后的美国巧妙利用。

“巴格达条约”的发展直接分化了阿拉伯国家的“集团”，将西方和苏联的对抗冲击力直接投射到中东国家之间。

此前，英美法三国在1950年达成控制中东局势协议，试图控制中东军事竞赛并尽可能保持平衡，并劝阻中东国家为了获得武器接近共产党阵营。然而，当法国违反原则援助以色列

40 Gamal Abdel Nasser, "Discours de Gamal Abdel Nasser (Alexandrie, 26 juillet 1956)." in *Notes et études documentaires*. Paris: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20-08-1956. Documents relatifs au Canal de Suez, n° 2206, p. 16-21., <https://www.cvce.eu/s/3a>.

41 温显娟：《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英美关系》，《历史教学》，2003年第10期，第51页。

42 欧曼编译：《收复苏伊士运河前前后后——埃及前经济财政部长谈内幕》，第86-89页。

列而打破平衡的时候，埃及感受到来自犹太国家的威胁，对武器的需求自然扩大了。而英美在武器谈判中却对埃及百般刁难，以迫使其在政治上向己方阵营妥协——但结果却适得其反。

尽管纳赛尔本人厌恶共产主义，但在实际决策中，埃及对国家独立自主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安全需求战胜了意识形态偏好，生死存亡之间，他别无选择。1955年，在新中国的牵线搭桥下，苏联通过捷克斯洛伐克与埃及签订军火贸易协定，这也“启发”苏联开始向叙利亚、沙特阿拉伯、也门和苏丹提供武器。英美国家尽管积怨于心，但正如前文所引的杜勒斯的评论，中立的埃及比共产主义卫星国更能容忍。于是，通过提供阿斯旺高坝贷款笼络埃及的计划正式成型。

1955年4月，英国曾表示不吸纳阿拉伯国家加入“巴格达条约”，以此要求纳赛尔缓和和对条约的攻击。然而，英国在年底的行动让埃及深感受骗：英国再次对约旦开启笼络攻势，争取其加盟；埃及随即发动了猛烈的宣传战，迫使约旦内阁因国内骚乱更替，新首相上台后明确拒绝加入“巴格达条约”。1956年3月5日，埃及、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又组建了“南层联盟”对抗“巴格达条约”，英埃关系又因此空前恶化，英美的笼络措施开始向惩戒转变。当年5月，英法决定向以色列出售武器，这使得纳赛尔更为忧虑，急需寻找又一个军火来源。纳赛尔的注意力转向新中国，并旋即于16日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成为英美认定埃及加入反美阵营的重要信号，触发了英美撤销援助等一系列制裁措施。⁴³

4. 衅发萧墙：埃以边界冲突及影响

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矛盾冲突，是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前的另一重要背景。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以来，围绕耶路撒冷问题和巴勒斯坦难民问题，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斗争尤为激烈。在苏伊士运河战争前夕，虽然阿拉伯国家始终宣传要消灭以色列，但是都没有制定出具体的行动计划。战争之间的几年内，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敌对关系主要体现在经济封锁和持续不断的边境冲突上。

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发动的经济封锁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新生的以色列的经济困难。阿拉伯各国中断了同以色列的经济联系，并且尽量阻止第三方同以色列的来往。埃及在经济封锁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埃及禁止任何船只通过苏伊士运河和亚喀巴湾前往以色列，因此以色列的船只能到达红海海域并保持和远东及非洲的联通，需要穿过蒂朗海峡。但埃及在拉斯纳斯拉尼（Ras Nasrani）部署了沿海炮兵连，以限制以色列通过这一重要的水道。埃及还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苏伊士运河的所有通道，进出以色列的船只只能绕道航行，承担远高于正常水平的运费。1951年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埃及对以色列的封锁政策违反1949年的停战协定和国际法，但是埃及漠视了这一谴责，并在苏联的政治协助下，扣押以色列的船只和货物，拘禁以色列的船员。⁴⁴在1955年秋季，以色列成立了一个特别军事单位，在蒂朗海峡地区待命，以在发生战争时袭击沙姆沙伊赫。

另一方面，阿拉伯国家采用制造持续不断的边境冲突的形式，对以色列造成安全威胁。在第一次中东战争停战协定签署后，由双方代表和联合国观察员组建的四个混合停战委员会负责对以色列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埃及之间的停火进行监督。但是，由于大量破坏停火协议的行动令委员会防不胜防，委员会能发挥的唯一作用就是记录冲突的次数。最早的冲突在叙利亚和以色列的边界线上爆发，最终导致双方在1951年均越过边界线采取军事行动。在以色列和约旦边境线上，从1949年6月到1954年10月，以色列指责约旦破坏停火协议1612次，约旦也指责以色列破坏停火协议1348次。根据混合停战委员会的记录，在此期间，以色列方面有124人，约旦方面有256人在冲突中死亡。

从1954年起，边界冲突的焦点逐渐转移到了以色列—埃及边界的加沙地带。除了一般的违反停火协定的实践之外，更多的冲突表现为越界袭击—报复—反报复的恶性循环。加沙地带聚居的巴勒斯坦难民的生活条件比约旦河西岸更为恶劣，对当局的不满情绪尤为激烈。纳赛尔政府在巴勒斯坦难民中组织了一些“费达因”（fidaiyyun）游击部队，深入以色列

⁴³ 王弄潮：《苏伊士运河危机的起因》，《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23期，第209-210页。

⁴⁴ Selwyn Ilan Troen and Moshe Shemesh ed. *The Suez-Sinai Crisis: A Retrospective and Reappraisal*, Frank Cass & Co. Ltd, 1990, p. 3.

特别是内盖夫北部的犹太人定居点，进行袭击、暗杀和破坏行动，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声称，在 1949 年到 1956 年间，共有约一千三百名以色列人在阿拉伯人的袭击中伤亡，而平民占其中的三分之二。伤亡事件使得以色列民众强烈要求当局开展报复行动。1955 年 2 月，以色列国防部长本·古里安（Ben-Gurion）下令以军越过停战线，偷袭埃及在加沙的军营，杀死埃军 38 人，这是苏伊士运河危机前导致中东局势紧张的重要事件之一。

在这一时期内，以色列持续站在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一边，并且积极维护同英国的关系。以色列积极响应美国在中东的集体安全计划和 1953 年苏联发生的所谓“犹太医生谋害斯大林”事件，都使得以色列和苏联的关系持续恶化下去。

英军撤离苏伊士运河的计划在以色列引起了恐慌，以色列人认为，英军撤离埃及之后，埃以之间少了一道隔离的屏障，未来以色列人不得不单独面对来自埃及的威胁。⁴⁵

1955 年，埃及从苏联获得大量武器，包括 530 辆装甲车（230 辆坦克、200 辆装甲运兵车和 100 辆自行火炮）、约 500 枚炮弹、多达 200 架战斗机、轰炸机和运输机，以及驱逐舰、鱼雷艇和潜艇。⁴⁶ 同年 10 月，埃及和叙利亚之间建立联合军事指挥部，1956 年约旦也加入了进来。这被以色列的领导人解读为埃及正在准备发动全面战争。以色列于是加快了备战的步伐，而这在本·古里安重新执掌大权后尤为明显。

5. 远人不服：伦敦到纽约的调停失败

随着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决定公诸于世，西方各国在震惊之余也开始谋划行动。首先做出反应的是英国、法国和美国。三国率先向埃及提出抗议，声称其收回运河的行为非法。8 月 2 日，三国外长在伦敦举行会议，会后发表联合声明称，运河公司是一家“始终具有国际性质”的国际机构，而埃及政府无权将其收归国有。他们还要求建立一个在“国际监督”之下的管理机构，来保障航行自由；最后建议，在伦敦召开 1888 年君士坦丁堡公约缔约国和使用国会议，共同商定解决苏伊士运河问题的方案。而这一建议被埃及据理批判后予以拒绝。8 月 16 日，英美法三国单方面召开伦敦 22 国会议，以多数票通过了杜勒斯提出的建立“苏伊士运河委员会”的计划。会后，投赞成票的 18 国代表组团前往埃及劝服纳赛尔接受该计划，但再次遭到拒绝。

9 月 23 日，英法两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再次要求对运河实施“国际管制”，但安理会否决了这一草案。

在一系列的外交活动均遭失败之后，军事行动成了留给英美和以色列的最后选择。⁴⁷

（三）战争阶段

6. 谋定后动：色佛尔三国密约（1956 年 9 月 -10 月）

英法首先开始了战争谋划。8 月 3 日，英国国防部开始了作战计划的制定。作战定于 9 月 6 日开始。指挥机构也被建立起来：联军的总司令和副总司令是来自英国的查尔斯·凯特利将军（General Charles Keightley）和法国的皮埃尔·巴尔若中将（Admiral Pierre Barjot），而地面部队的司令和副司令则是英国的斯托克韦尔（General Hugh Stockwell）和法国的安德烈·博弗尔（General Andre Beaufre）。经过商讨，对埃及的作战计划被分为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作战是尽快摧毁埃及的空军从而夺取制空权，第二阶段作战是登陆部队在海上等待期间，空军继续破坏埃及境内的基地以及各种其他设施，第三阶段的作战则在 9 月 13 日开始，部队将在苏伊士运河北端进行登陆作战，从而夺取对于运河地区的控制。

准备对埃及进攻的第一阶段在于预备作战的武器供应，以色列想方设法加速来自法国的军备物资。据当时的参谋长摩西·达扬（Moshe Dayan）所说，1956 年 9 月 1 日，以色列驻巴黎军事参谋部发了电报，向他通报了针对苏伊士运河问题英法两国的计划，并告知他联合部队指挥官皮埃尔·巴尔若中将认为，应邀请以色列参加行动；本·古里安表示“原则

45 肖宪：《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第 158 页。

46 Selwyn Ilan Troen and Moshe Shemesh ed. *The Suez-Sinai Crisis: A Retrospective and Reappraisal*, p. 3.

47 雷钰、苏瑞林：《中东国家通史：埃及卷》，第 295 页。

上”愿意合作。六天后，以色列行动负责人与法国军事代表举行了一次试探性的会议，而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继续在巴黎与法国国防部长莫里斯·布尔吉斯·莫努里（Maurice Bourgès-Maunoury）进行会谈。月底，以外交部长戈达·梅尔为首的以色列代表团（包括佩雷斯和达扬）与法国代表团进行了会晤，其中包括法国国防部长和法国外交部长克里斯蒂安·皮诺（Christian Pineau）。

10月21日，应法国人的邀请，本·古里安（Ben-Gurion）在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和莫西·达扬的陪同下飞往法国色佛尔。法国总理盖伊·莫列特（Guy Mollet）参加了这些谈判，由英国外交大臣塞尔温·劳埃德（Selwyn Lloyd）和一名高级官员组成的英国代表团也参加了谈判。按照总参谋长达扬的设想，以色列部队首先向米特拉山隘（Mitla Pass）空投1个营，作为对之前埃及袭击行动的反应。在英法军队按之前的预定计划开启战端的情况下，以色列开始配合英法的军事行动并且正式开始在西奈地区遂行作战任务。如果英法军队不参加战斗，那么以色列将撤回此前空降的部队，并且可以向公众解释这是一次针对埃及的袭击行动。法国总统对于以色列方面提出的计划表示同意并且立即决定给予以色列必要的军用装备。三国代表在达成一致后签署了文件。

10月25日，以色列发布了对于全国武装力量实行动员的命令。达扬的目的在于，使全世界以为以色列下令动员仅仅是为了再一次对约旦实施之前已经开始的报复性进攻。

开战前，埃及陆军总兵力约为15万人，其中部署在西奈半岛的东部军区有三个师，兵力共3万余人。陆军有坦克530辆、火炮500门。其中，第3步兵师防守阿里什、腊法、阿布奥格拉三角地区；第8巴勒斯坦师防守加沙地区。空军有作战飞机255架，然而，能出动的战机数量只有130架，这当中的70架是MIG-15和“吸血鬼”式。

在1956年10月初，以色列国防军总兵力约10万人，拥有坦克400辆、车辆450辆、火炮150门、作战飞机155架。英法两国协商后将作战任务做了如下的划分：法国空军负责夺取战时的制空权和以色列的领空防御；以色列空军的155架作战飞机用于支援地面部队的作战。在战争爆发的前一天，以军完成了对于大部分野战部队的动员。南部军区的总兵力为4.5万人，以军将12个旅分为了4个师以便于统一指挥。⁴⁸

7. 西奈兵变：以色列发兵突袭（1956年10月）

在10月29日下午4时20分，4架运输机飞越了西奈半岛的边界。17时，爱丹上校（Lieutenant-Colonel Rafael ‘Rafal’ Eitan）的指挥的伞兵营，和阿里埃勒·沙龙（Colonel Ariel Sharon）上校指挥的202伞兵旅部队，降落在西奈半岛中部米特拉山隘东端。这批约400名士兵降落地距以色列156英里，距苏伊士运河45英里。两个小时之前，四架以色列P-51野马战斗机进行了一次先遣行动，切断了西奈半岛所有的电话线。21时，在法国空军的空中支援掩护下，以色列国防军空投各种军用物资。对此，埃军并没有察觉到。

以军为了给予此前空降在米特拉山隘的部队以配合，空降旅的2个空降营、2个“纳哈尔”连，1个坦克连共3000余人，于29日16时在以埃边境附近集结待命。然而此时，部队最急需的运输车辆中只有约50%可以立即投入使用，并且从以色列边境到米特拉山隘需要长达3个小时的时间。在此之前，空降部队陷入了可能被埃军包围的危险。

埃军总司令部在29日19时知道了以色列国防军进攻米特拉山隘的消息，纳赛尔总统接到报告的时候已经是20时。与此同时，驻扎在苏伊士河西岸的第2步兵旅中的两个步兵营已经接到了埃及东部军区司令阿密尔的命令，进攻以军空降在米特拉的部队。但是埃军遭到了以色列空降部队的伏击。

10月30日3时，沙龙部队的侦察分队到达萨马德（Themed）。萨马德以西8公里的埃军阵地阻止了沙龙部队的前进。埃及陆军的2个连在此防守。沙龙的部队迫使埃军因伤亡惨重放弃阵地后，继续向米特拉山隘前进。8时，以色列空军向地面部队空投了各种补给物资。17时25分，以军占领纳赫勒（Nakla）并在此地留下第3营。沙龙旅用时一天6个小时将战线向前推进了250公里，在30日22时30分和空降部队在米特拉山隘汇合。

48 田上四郎：《中东战争全史》，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第46页。

埃及一边，30日9时以后，第2步兵旅的先遣部队开始向米特拉山隘挺进，但遭到了对方迫击炮的火力压制。与此同时，4架埃及空军的MIG-15战斗机攻击了以色列国防军的空降部队。埃以双方之间的小规模战斗进行了1小时，并没有任何一方取得了决定性战果。不过，埃及陆军夺取了米特拉山隘东端入口的控制权。30日中午，以色列空军飞临米特拉上空实施对于空降部队的火力支援，向埃及陆军第5步兵营的阵地发射火箭和投下炸弹后，又攻击了正在渡过苏伊士运河的埃及陆军步兵。埃及军队的防空作战收效甚微。以色列空军接着又对米特拉山隘西侧的埃及陆军纵队进行了轮番的火力打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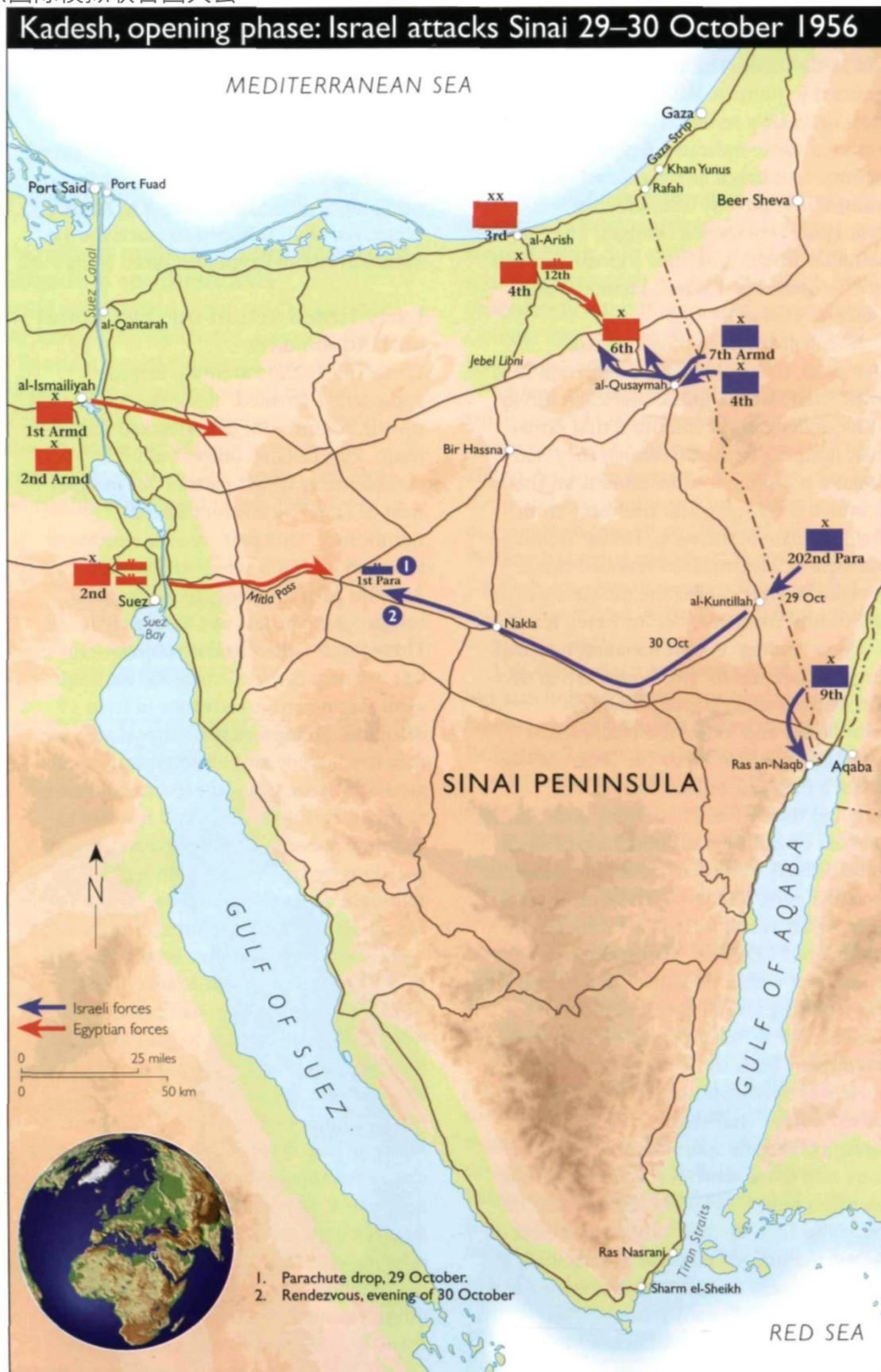


图 4：以色列突袭西奈半岛（第一阶段）：1956 年 10 月 29 日—30 日⁴⁹

49 图片来源：Derek Varble, *The Suez Crisis 1956*, Osprey Publishing, 2003, p. 3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部在 10 月 31 日晨批准了此前沙龙上校进攻米特拉山隘东端的请求，但同时又要求不能开展大规模的战斗。埃军第 5 和第 6 步兵营在 30 日下午被以军航空兵猛烈打击后，在海坦谷地（Heitan Defile）地势稍高些的东部部署防御阵地据守。以色列侦察队的先头部队在 31 日中午通过海坦谷地时，遭到了埃军炮火的猛烈打击。侦察队的后续部队投入战斗，但由于前一天被摧毁的埃及军队的车辆堵塞了道路，侦察队被挤在谷地内无法向前推进。油料车和弹药车也被击中起火。面对这一情况，沙龙上校命令所有炮火对埃军实施压制射击，同时以 2 个连的兵力对海坦谷地东部发起冲击。以色列国防军在 31 日黄昏时占领了该处，长达两个半小时的肉搏战后，20 时许，战斗结束。在此次始料未及的战斗中，沙龙旅遭受了惨重的打击，伤亡人数达 158 人；埃军则伤亡 100—150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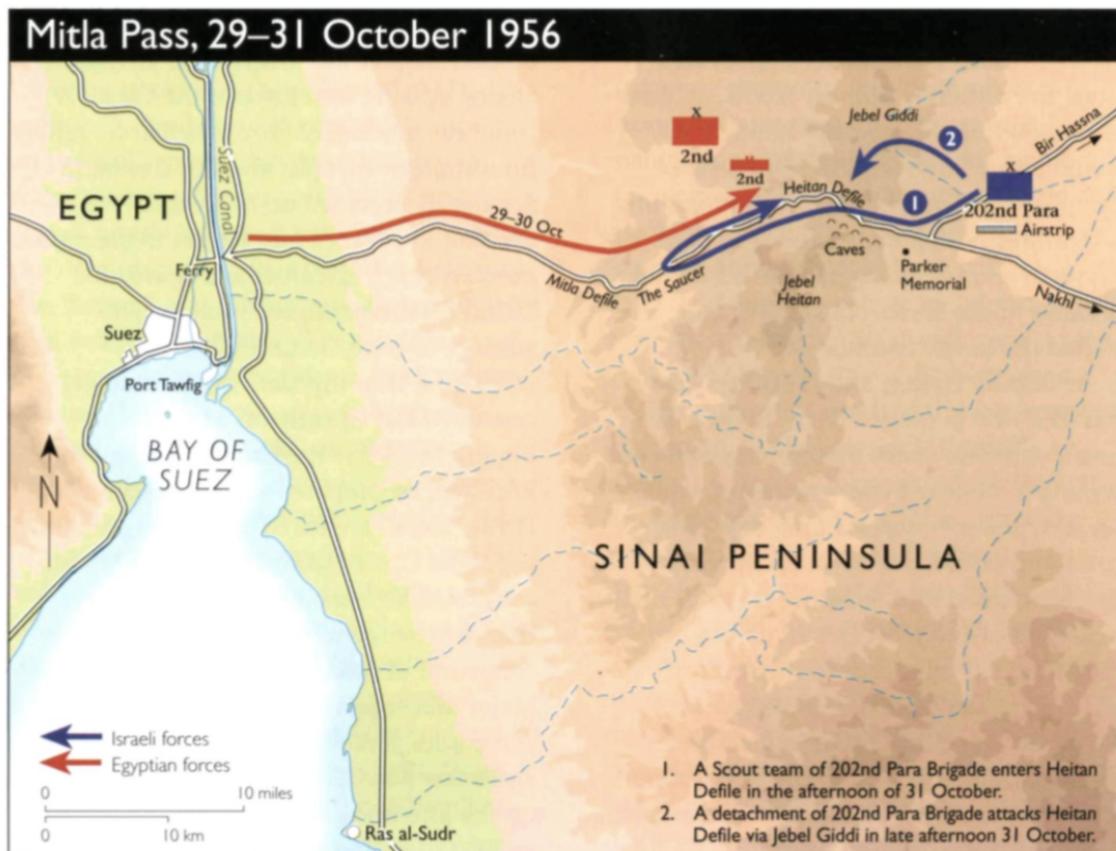


图 5：米特拉山隘：1956 年 10 月 29 日—31 日⁵⁰

第二阶段的重要战役发生在阿布奥格拉 (Abu Aoueilila)。阿布奥格拉是埃及军队在西奈半岛北缘非常重要的防区，卡在通向阿里什 (al-Arish) 的道路之上。这也是达扬参谋长的进攻重点。第 37 机械化旅归入沃拉赫上校 (Colonel Yehudah Wallach) 指挥的原有 3 个旅中路师之下。在英法两国军队确定按约定参战之前，中路师的两个旅暂时未被达扬参谋长投入战斗。开战时，沃拉赫上校首先派遣第 4 旅攻击库赛马 (al-Qusaymah)，第 10 旅攻击乌姆·卡泰夫 (Umm Qataf)。第 4 旅的任务是打通库赛马到马纳赫勒和哈萨纳 (Bir Hassna) 的两条公路，并在第 10 旅的进攻受挫时由南向北进攻阿布奥格拉和乌姆·卡泰夫这两个阵地。29 日深夜，第 4 旅在车辆、弹药严重紧缺的情况下突破了埃以边境，并于 30 日 6 时夺得了对于库赛马的控制，然后又向三个方向派出了侦察分队。辛霍尼司令 (General Asaf Simhoni) 并不知道达扬的限制，所以他命令第 7 装甲旅向库赛马挺进，又命令原先 31 日

50 图片来源：Derek Varble, *The Suez Crisis* 1956, p. 31.

才开始向埃军进攻的第 10 旅立即穿越埃以边境对乌姆·卡泰夫阵地发动攻击。第 7 旅推进到乌姆·卡泰夫南面时遭到埃及陆军的猛烈攻击，损失了 6—7 辆坦克和装甲运输车，随后连续发起了三次进攻也都被击退。旅长认为从正面攻占乌姆·卡泰夫的希望渺茫，于是决定派出侦察分队向达伊卡山隘方向发起攻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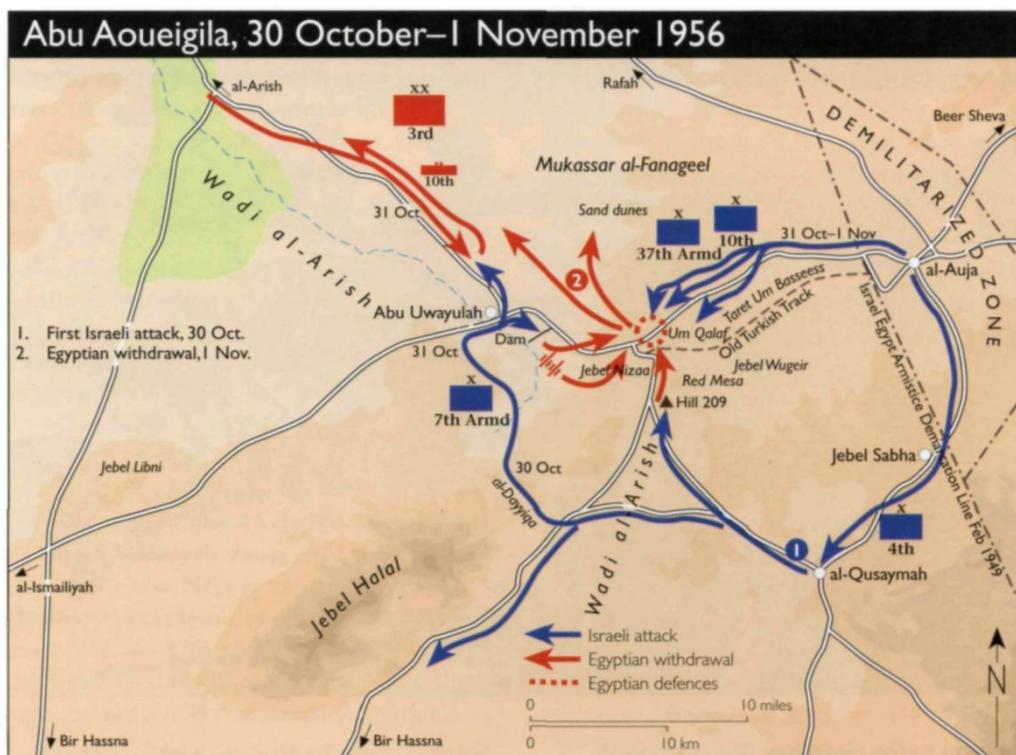


图 6：阿布奥格拉防区：1956 年 10 月 30 日 -11 月 1 日⁵¹

30 日上午 11 时，达扬飞抵库赛马。第 7 旅已进入库赛马的情况被他发现后，他大发雷霆。达扬命令第 4 旅的一部兵力立即向纳赫勒方向推进，从而尽快攻占阿布奥格拉及乌姆·卡泰夫。30 日傍晚起，第 7 旅和第 10 旅合击乌姆·卡泰夫和乌姆·希汉（Umm Shihan）两个埃军防区的战斗打响。17 时，第 10 旅离开了奥贾（al-Auja）并紧接着对乌姆·希汉组织了几轮攻势，但都被埃及军队击退而无果而终。第 10 旅旅长古迪尔上校（Colonel Shmuel Gudir）那日夜里在乌姆·泰莱帕南端无所作为，甚至都没有去组织新一轮的进攻。在达扬的催促之下，第 10 旅于 31 日 8 时 30 分再次发动了新一轮的攻势。但步兵旅进攻正面宽达三千米，以色列部队在没有炮火打击作为火力支援的情况下就发起攻击，加之遭到埃及陆军精准的火炮打击，因而进攻不顺。因此达扬决定撤换第 10 步兵旅旅长古迪尔，让塔尔上校（Colonel Israel Tal）担任继任旅长一职，同时下令第 37 机械化旅对乌姆·卡泰夫发动攻势。11 月 1 日 2 时，第 37 旅完成了进攻前的准备工作，首先发动了攻势。但步兵营遭到埃军火炮和反装甲武器大规模的火力打击，随后部队步入了雷区，伤亡非常惨重，军官中的大部分人都已经受伤，旅长戈林达上校（Colonel Shmuel Golinda）阵亡，几次发动的进攻也都以失败告终。该部 1 日清晨又一次发起的攻势同样被埃及陆军的反装甲武器击退。以军总参谋部因此做出了暂停进攻乌姆·卡泰夫的决定。

51 图片来源：Derek Varble, *The Suez Crisis* 1956, p. 38.

第 7 旅下辖的 M-4 坦克营花费了 10 个小时去穿过达伊卡山隘 (al-Dayyiqā)，从而在 31 日 5 时对阿布奥格拉发动了攻势。虽然埃及军队的拼死抵抗和精准的火力打击使得以色列国防军推进得相当艰难，不过以色列国防军还是成功攻占了阿布奥格拉的道路交叉点。埃及陆军第 10 步兵营于中午到达了阿布奥格拉，但由于遭到以军航空兵的攻击，部队行军纵队被切断，所以进攻并没有能持续很久。这时，埃及陆军第 18 步兵营也在火力支援下开始进攻，双方军队展开了激战。到了 31 日，以色列国防军阿丹营 (Adan) 进攻并在当夜成功控制了鲁瓦法 (Ruafa) 水坝，而后转入了防御态势。后勤部队也在 11 月 1 日凌晨到达。⁵²



图 7：战线转移，埃及军队撤出西奈半岛：1956 年 11 月 1 日⁵³

52 田上四郎：《中东战争全史》，第 47-50 页。

53 图片来源：Derek Varble, *The Suez Crisis* 1956, p. 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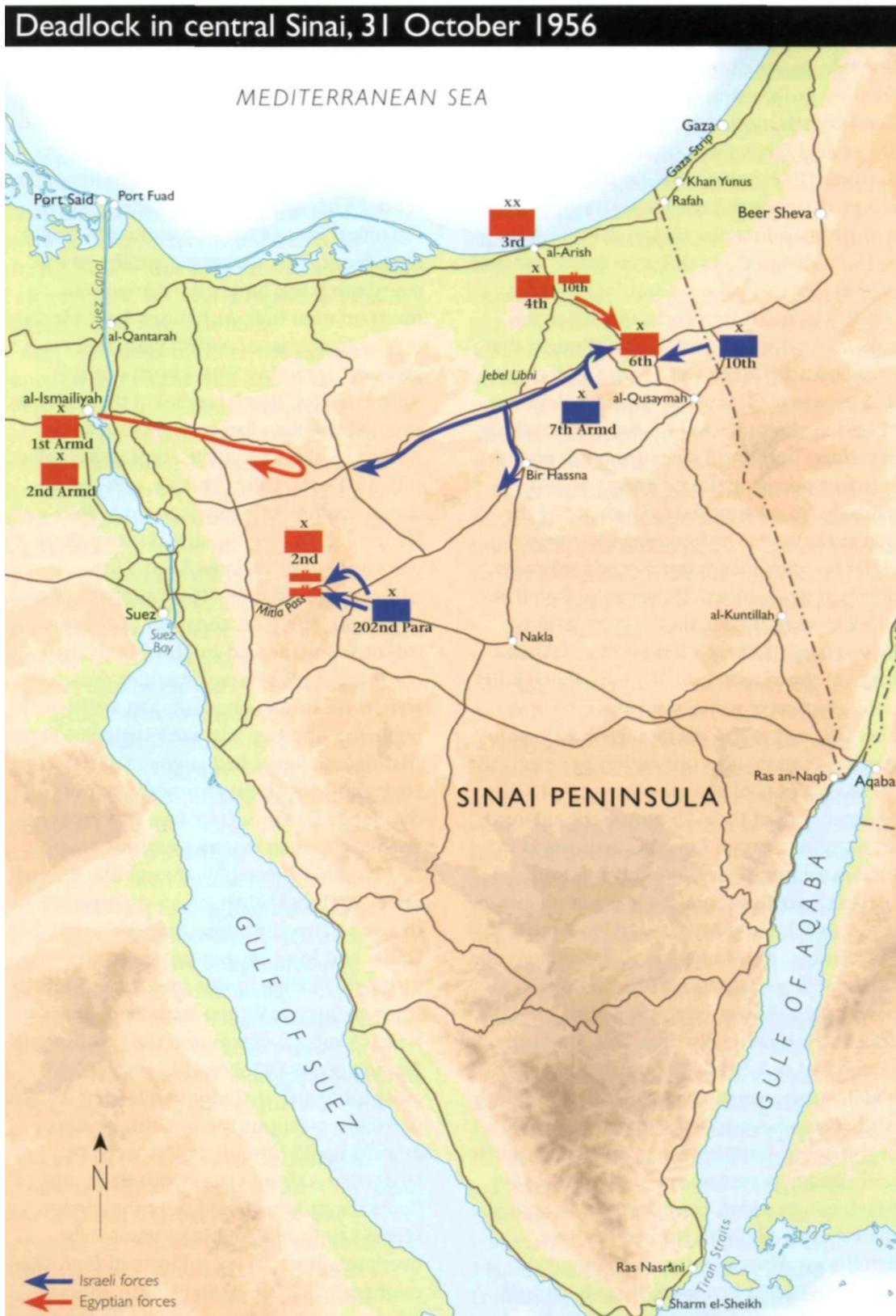


图 8：西奈半岛中部对峙僵局：1956 年 10 月 31 日⁵⁴

54 图片来源：Derek Varble, *The Suez Crisis* 1956, p. 34.

8. 战端扩大：英法派军出击（1956 年 11 月初）

埃、以两国政府在 30 日下午收到了英国和法国的最后通牒，其内容如下：1) 埃及和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陆军、空军和海军的一切敌对行动；2) 两国军队相互后撤，埃军撤至苏伊士运河西岸，以色列国防军撤至运河东 10 英里处；3) 两国政府同意英法两国军队，依照国际法相关规定，取得运河通行权，并暂时控制富阿德港（Port Fuad）、苏伊士城和伊斯梅利亚，以隔离敌对的埃及和以色列军队，保障各国船舶航行。这三项内容意味着英法两国对于埃及发出了最后警告，向以色列表明了英法两国的开战决心。英法两国政府要求埃及、以色列两国在 12 小时内就最后通牒做出回复。以色列答复接受要求；纳赛尔则在 30 日深夜表示埃及拒绝英法两国的通牒要求。

10 月 31 日 6 时，纳赛尔命令部署在尼罗河流域以及在苏伊士运河地区的防空部队进入戒备状态以防御可能的空中袭击；此外，为了守住苏伊士运河，纳赛尔下令，在英国和法国军队进攻时撤回部署在西奈半岛地区的军队。同时，部署在运河西岸的埃及陆军第 4 装甲师挺进到哈萨纳，从而阻止以色列国防军的空降兵部队与以色列陆军的第 7 装甲旅会合。埃及陆军第 4 装甲师第 1 旅于 30 日深夜开始渡河，紧接着是第 2 旅。埃及陆军第 4 装甲师师长贾马尔·穆哈默德准将在 31 日晨下令第 1 旅迅速向哈萨纳挺进，试图阻挡以色列国防军在中路的迅速推进。

英法联军的斯托克韦尔中将在 29 日黄昏拿到了以色列国防军开始对埃及发动军事行动的报告。英法空军在 10 月 31 日 19 时，也就是英法两国发出最后通牒后的第 25 个小时，英法两国的空军对于埃及境内的铁路、埃及军队的防空武器阵地和军营进行了轰炸。联军的舰载机在 11 月 1 日至 3 日继续对于埃及空军机场实施了多次轰炸，埃及空军 260 架的飞机被毁。因为这些轰炸，纳赛尔决定暂停对西奈半岛的增援，并下令原先部署在西奈地区的埃及部队向苏伊士运河方向进行撤退。从 31 日夜晚，在加沙地区的埃及部队开始撤退。以色列国防军并没有察觉到这次撤退。以色列陆军第 37 旅的侦察分队 1 日从俘获的两名敌方士兵的供述中才得知，埃及陆军第 6 旅昨夜就已经全部撤离了。11 月 2 日，以色列陆军第 37 旅匆忙向乌姆·卡泰夫挺进，试图和以色列陆军第 7 旅在阿布奥格拉会合。在这之后，沃拉赫上校命令以色列陆军第 10 旅占领乌姆·卡泰夫和乌姆·希汉，在阿布奥格拉地区的战斗也就此告一段落。



图 9：以色列占领西奈半岛，英法入侵运河区：1956 年 11 月 2 日—7 日⁵⁵

55 图片来源：Derek Varble, *The Suez Crisis 1956*, p. 47.

11月1日，北路师长哈依姆·拉斯科夫准将下达对加沙地区发起进攻的命令，计划首先夺取腊法（Rafah）地区的控制权和扫荡在加沙地区的剩余埃军部队，而后打通通向阿里什的道路，在这之后攻入苏伊士运河区。凌晨，以色列陆军第27旅开始对埃及陆军发动了攻势，埃及陆军不久后就开始逐步向阿里什方向撤退。尽管27旅主力部队对撤退的埃及陆军进行了追击，但由于以色列军队夜里需要补给油料，埃军趁机撤离，因此当以色列陆军第27旅进入阿里什时，那里已经没有任何的埃及军队。以色列陆军第11旅在2日6时开始进攻加沙地区并在遭受零星抵抗后，于2日上午基本取得了对于加沙的控制权。



图 10：腊法、阿里什和加沙地带：1956 年 10 月 31 日 -11 月 3 日⁵⁶

在沙姆沙伊赫（Sharmel- Sheikh）战线，约菲上校指挥的以色列陆军第9步兵旅承担解除埃及军队对亚喀巴湾封锁的任务。他们在31日下午10时在孔蒂拉（al-Kuntillah）集结做好了战斗准备。11月2日5时，该旅收到向前进发的命令后，就立即开始了对埃及军队的进攻，至当天13时，已推进了约100公里，与此同时，在苏伊士运河方向上，以色列国防军也已经抵达距东岸15-16公里处。第9旅4日14时到达沙姆沙伊赫以北5公里的地方，立即着手进攻埃及军队的防区。他们在5日凌晨2时开始进攻。首轮进攻受到雷区和铁丝网阻拦，第二轮进攻在5时30分开始。9时30分，第9步兵旅成功占领了沙姆沙伊赫要塞。埃军损失995人，以军伤亡42人。5日清晨5时，以色列空降兵沿着苏伊士湾公路向南推进到达了沙姆沙伊赫南边，并和以色列陆军第9旅取得了联系。当第9旅正准备对埃及军队的要塞指挥所发动攻势时，空降兵部队攻入了要塞，并在9时30分拿下了埃军指挥所。这是自空降在米特拉山隘以来，空降兵部队发动的最后一次进攻。至此，埃及和以色列两方之间的战斗结束了。⁵⁷

56 图片来源：Derek Varble, *The Suez Crisis 1956*, p. 42.

57 田上四郎：《中东战争全史》，第51-5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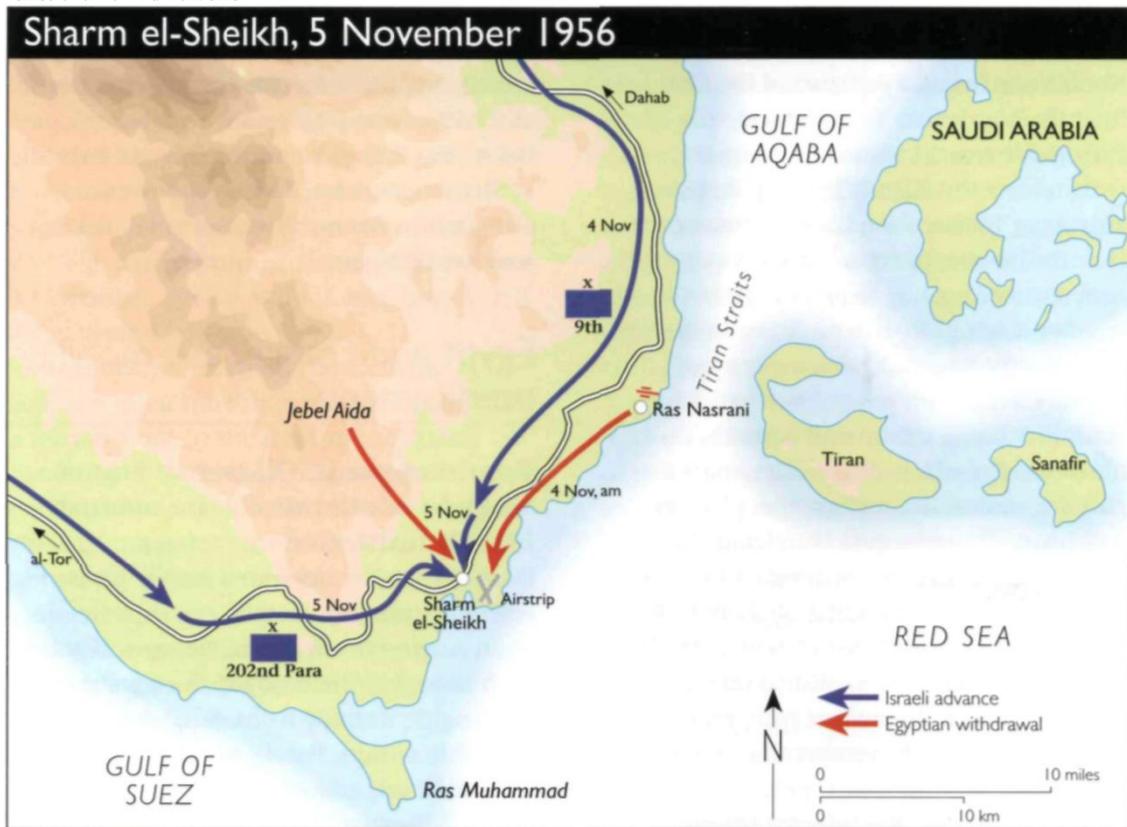


图 11: 沙姆沙伊赫: 1956 年 11 月 5 日⁵⁸

9. 强压战火: 停火和最终撤军 (1956 年 11 月 -12 月)

以色列发动进攻的第二天, 即 1956 年 10 月 30 日,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做出了反应。美国提议讨论以色列入侵埃及的问题, 呼吁各国保持冷静克制并带头要求以军撤退。埃及当日在联合国安理会的申诉请求被英法使用否决权阻止。美国关于阻止战争并派出联合国军的决议有七国赞成, 英法均使用一票否决权。

11 月 2 日, 联合国大会投票表决美国呼吁立即停火的建议, 决议最终通过。同日, 英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取存款的行动招致美国的阻挠。11 月 4 日, 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建立一支国际部队以实现和监督停火的决议, 联合国第一支维和部队诞生。

英军斯托克韦尔司令于 11 月 4 日作出了决定: 同在苏伊士运河东岸的以色列国防军的联络由法军负责, 法军同时负责守卫两座关键桥梁和供水站。这个方案也得到了博弗尔副司令的赞同和本国政府的许可。英国皇家海军的舰载机在 5 日清晨, 对埃及在富阿德港和塞得港的防御阵地进行了轰炸。第 16 空降旅第 3 营在 8 时 20 分降落并迅速夺得了加密尔机场。法军第 2 空降团的 500 名空降兵于 8 时 35 分在富阿德港降落, 尽管遭到了埃军的顽强抵抗, 但他们依然成功拿下了供水站。英、法军的第二批空降部队在 13 时 45 分开始降落, 并且空袭也同时让埃及军队陷于瘫痪。

埃及军队穆占伊准将 (Brigadier Salaheddin Moguy) 在 5 日的下午同意了塞得港市政府提出的进行停火谈判交涉的要求。穆古伊准将与法国军队的指挥官于 16 时在供水站进行了会面, 提出了维修供水站的要求, 法国方面同意在维修供水站完成之前暂时进行停火。停火时间将一直持续到 5 日 22 时 30 分。⁵⁹

英国皇家海军第 3 海军陆战旅的第一批登陆部队在 6 日上午 6 时 50 分在塞得港开始了登陆。同时, 法国海军陆战旅也在富阿德港开始登陆。在英法军队登陆前实施的航空兵空中轰炸和海军的舰炮射击成功让埃及军队在海岸的守备队陷于瘫痪, 因而英法军队的登陆作战开展得非常顺利。

58 图片来源: Derek Varble, *The Suez Crisis 1956*, p. 50.

59 田上四郎: 《中东战争全史》, 第 54 页

为了控制不断扩大的战事，美国双管齐下，迅速启用了军事和金融的施压工具。接到总统指令后，部署在各地的美军进入了战备状态，携带核武器的航母驶入地中海。美国政府抛售英镑的举动使得英镑贬值 15%。美国还停止对英经济援助，并否决英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申请。美国的一系列行动使得英国当时的黄金、美元储备下降到 20 亿美元的最低保险数字之下。美国后来还拒绝启动中东应急委员会，并表示将使用西半球的石油供应满足欧洲在中东石油断供时的需求。⁶⁰

来自国内外的强大压力使得英、法两国政府不得不同意停战。虽然苏联当时正在深深卷入匈牙利事件之中，但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声称，如不同意停战将可能对于英国本土实施核攻击——这样的声明显然是一种非常强硬的威胁。美国的态度也同样非常强硬，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表态很坚决，在下令部署在全球的美国军队进入戒备状态的同时，要求英、法和以色列迅速停止一切针对埃及的军事行动。英法两国政府在外界的强大压力面前不得不屈服了。当晚 19 时 30 分，斯托克韦尔司令收到了来自英国政府发来的指示：部队必须在 7 日 0 点前停止一切战斗行动。接到本国政府停战命令的斯托克韦尔司令迅速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此事。伦敦和开罗的时差为 2 小时。斯托克韦尔司令理解的 7 日 0 时指的是伦敦时间，于是他命令第 16 空降旅旅长巴特勒准将尽可能地沿着苏伊士运河南下，在最大程度上利用停战前剩余的若干小时。22 时 30 分，第 16 空降旅在接到命令后迅速向南推进，在 7 日 0 时到达卡普后停止了进一步的行动。至此，第二次中东战争结束。⁶¹

12 月 22 日，英国和法国的所有军队撤出埃及。1957 年 3 月 8 日，以色列全部军队撤回停火线之后，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埃及 - 以色列边界。

60 谷雪梅：《利益决定立场——英美应对苏伊士运河危机的外交政策》，《宜宾学院学报》，2010 年第 10 期，第 39 页。

61 田上四郎：《中东战争全史》，第 56 页。

二、相关国家态度

（一）美苏历史中东战略

在详细介绍美苏两国对苏伊士运河危机的态度之前，有必要对两国在苏伊士运河一带，甚至是整个中东地区的历史战略和行为诉求进行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杜鲁门主义的出台标志着冷战帷幕的揭开。而中东地区长久以来都是国际关注的焦点，其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其联结欧、亚、非三大洲的地理位置，还体现在其石油资源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极高价值和其在地缘政治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在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之下，优越的地理条件及其重要战略地位，使得中东逐步成了 50 年代美苏冷战的主要战场之一。

从历史上而言，中东地区既是欧美国家争夺的中心，也是斯拉夫人长期觊觎的土地。美俄两国与中东地区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的奥斯曼帝国时期。沙皇俄国自彼得一世统治起，就开始不断针对中东地区进行疯狂的扩张。在 19 世纪，沙俄对奥斯曼帝国、波斯和阿富汗的入侵和扩张达到了顶峰，但碍于英法等国在这一地区的控制力以及国家实力对比，斯拉夫人始终未能对中东地区施加有效的影响力。与俄国不同，美利坚合众国在建国后，便与奥斯曼帝国建立了一定的经济往来，并进行了适当的文化渗透。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两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平衡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由于国家内部剧烈动荡带来的极大变化，沙皇俄国及其取代者苏联几乎无暇管理对外事务，更无法与中东国家建立密切联系。对美国而言，在一战中，中东地区的领土主要由英国和法国托管，且在一战结束后，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凡尔赛合约》，中东国家也基本没有外交自主权，这使得美国与中东国家之间几乎不存在官方交往，无法趁虚而入，通过各种手段介入中东地区。⁶²但美国也借此机会，与未来苏伊士运河危机的主角——埃及，建立了在文化及教育领域的密切联系。美国人在埃及大量建立学校、医院等社会服务机构，为埃及人提供了更好的文化、教育与医疗条件。这些措施极大地增加了美国在埃及的影响力，也有效地改变了埃及人对美国的刻板印象。⁶³

应当得到注意的是，埃及在中东地区的重要性并不仅来自古埃及流传的磅礴历史文化，还在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从地理意义上，埃及是亚、欧、非连接的交点，也是东方与西方的分界线；从战略意义上而言，苏伊士运河的开凿和石油经济的发展，使得埃及成为了世界的“心脏”，这块“磁铁”吸引着欧美国家的高度关注。⁶⁴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世界秩序重整，美苏迎来了进入中东地区的窗口。在二战期间，苏联建立并维持了与埃及、阿富汗等国的友好关系，为他们提供在经济及基础设施方面的援助；出兵伊朗，尝试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为基点，延伸自己在中东的影响范围；积极干预中东各国在二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与此同时，美国军队进驻中东，在中东地区扶植亲美势力，树立反殖民主义者形象，并建立与中东国家的官方联系。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苏的战时同盟破裂，这种对中东地区的同时介入逐渐演变成了势力范围的冲突。1946 年发生的伊朗危机十分具有代表性。1945 年七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波茨坦展开战时第三次会晤，会晤的众多成果中的一条要求苏联在 1946 年三月从伊朗撤军，但斯大林表示，由于担心巴库的颠覆和破坏活动，因此不打算执行撤军计划。美国在杜鲁门上台后，就伊朗问题和苏联进行了漫长的谈判，最后甚至以军事相威胁，并支持伊朗诉诸联合国，控告苏联违背从伊朗撤军的决议。在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下苏联被迫于 1946 年五月撤军。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积累上的差距、同时期军事实力的差距，以及国际舆论支持上的差距，使得两国在中东控制力的天平向美国大幅度倾斜。尽管在这一时期，英法对于中东地区依然有着绝对的统治地位，但国力对比带来的影响力分散也已经成为了不争的事实。

62 兰岚：《美国在中东——艾森豪威尔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 15 页。

63 张士智，赵慧杰：《美国中东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 57 页。

64 褚浩：《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埃及政策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年版，第 8 页。

综上，简单概括美苏两国历史上的中东战略——尽管双方实现的结果大不相同，但两国采取了极为类似的方式，并且有着基本相同的战略诉求：先通过军事或非军事手段介入，再逐步建立官方联系，随后尝试以官方联系为核心扩散在地区的影响力。因此，冷战对立的大背景、类似的行为方式和共同的目标，意味着当苏伊士运河危机出现时，美苏双方可能在某一个时刻，基于一个整体目标达成一致，也可能在另一个时刻出于政治对立而产生对抗。

下面详细介绍美苏两国在苏伊士战争前后的态度和战略。

（二）美国态度

在中东，美国有两个战略目标，一是遏制苏联的渗透，二是尽可能改善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的关系。

1952年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于1953年一月任命共和党人、冷战初期美国外交政策主要制定者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为国务卿。杜勒斯认为，美国应当尽可能转变对阿拉伯国家的态度，他强调中东与近东地区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这一地带所富有的重要资源——石油、锰、铬、云母及其他矿产资源与美国的国家利益密切相关。⁶⁵1953年五月，杜勒斯出访中东，在这次出访中，美国表达出了对阿以冲突新的政策和立场，这些内容与成果体现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55/1号文件中，文件指出，“美国应当明确，以色列将不会仅仅因为它的犹太人口而获得超过任何阿拉伯国家的优惠待遇，从而表明我们对以色列的政策只限于帮助以色列成为一个与阿拉伯国家和睦相处的能够生存的国家，我们在每个阿拉伯国家的利益实际上与我们在以色列的利益是一致的”。⁶⁶这表明，美国对这一地区外交政策逐渐向美国新一阶段的利益倾斜。美国不重视甚至是轻视阿拉伯世界的倾向，以及以色列的扩张政策将会被改变。

1955年八月，杜勒斯在纽约国际关系委员会全面阐述了美国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和立场，并首次正式就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提出相应解决方案。这一方案包括三个主要内容：签订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集体安全条约框架，避免战争再次发生；资助巴勒斯坦难民返回故乡；确定由英美两国担保的、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永久边界。相比以往国际社会对巴以冲突的解决方案而言，杜勒斯这一方案显得更为折中——让阿拉伯世界与犹太人在西方监督下共存，并未尝试将任何一方完全驱逐。但这一方案并不能让任何一方满意：阿拉伯世界并不想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以色列也并不要对边界问题做任何的调整甚至是讨论。美国在推行战略中的初次尝试以失败告终。

与此同时，阿拉伯世界也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恰巧以“心脏地带”埃及最具代表性：在二战结束后的短短几年内，埃及国内的民族解放运动急速发展。1951年，埃及废除了1936年《英埃同盟条约》。1952年七月，由未来十几年埃及的伟大领袖——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率领的“自由军官组织”颠覆了法鲁克王朝，埃及共和国应运而生。在纳赛尔任职期间，“纳赛尔主义”在埃及以及中东地区得到广泛宣传，反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封建主义的浪潮在阿拉伯世界波涛汹涌，土地改革、国有化政策也使埃及成为阿拉伯国家竞相效仿的对象。

1954年7月27日，英、埃两国签署协定，协议要求英国应当在协议签署后二十个月内撤出所有在埃及的驻军，但可以在境内保留相应设施，同时当埃及及周边阿拉伯国家受到来自中东以外的武装进攻时，应当为英方提供适当便利。考虑到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地位以及目前羸弱的殖民统治，英国希望将这一协议当作是在中东扶植其他势力的“缓兵之计”，但纳赛尔却依照这一协议，在阿拉伯世界大肆宣扬英国在埃统治的终结，以此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反殖民主义领袖的形象。这一协议及其后续冲突，也为未来的苏伊士运河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英、法等传统殖民帝国在中东地区式微已成定局，在推动巴以和平进程失败的前提下，美国将战略的重心转移到了“遏制苏联渗透”这一目标上。随着亚非地区新兴民族国家蓬勃发展，第三世界已经崛起成为国际社会不可忽视的力量。雅尔塔体系早已划分了欧洲的权利

65 杜勒斯：《杜勒斯言论选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54页。

66 崔丕：《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史探微》，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87页

归属，但对于广阔的非洲大陆和亚洲地区的权利范围还没有划定明确的边界。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中东地区更成为了美国在遏制政策中创造优势的重中之重。⁶⁷

1953年杜勒斯访问中东时，就提出了关于建立中东军事集团的计划。杜勒斯认为，在中东建立地区性的军事集团，是保护欧美国家在西方利益、缓和中东内部矛盾，同时避免阿拉伯世界向社会主义阵营倾斜的唯一方式。⁶⁸ 基于这一考量以及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制定的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的战略计划，美国开始尝试牵头在中东缔结大量军事同盟。吸取了杜鲁门时期“中东司令部”与“中东防御组织”失败的经验教训，美国不再直接参加任何一个军事集团，而是转向幕后进行操纵。此后，与苏联为邻的伊朗、土耳其、阿富汗等国组成了“北层防御集团”（Northern Tier），以这一防御集团为原点，西方国家同“北层”国家签订军事援助协定，控制他们的武装力量，“北层”国家再在美国的推动下和其他中东国家签订双边军事协定。通过无数的双边军事合作，一个中东军事集团逐步形成。

这之中最具代表性的，也最重要的便是《巴格达条约》，即《伊拉克和土耳其间互助合作公约》。1955年2月24日，伊拉克和土耳其在巴格达签订《巴格达条约》，在随后的八个月内，英国、巴基斯坦和伊朗相继加入《巴格达条约》。同年11月，“巴格达条约组织”正式成立，并设立了部长理事会和军事、经济、反颠覆、联络等委员会。美国在遭遇了斡旋阿以冲突上的失败后，希望能够协调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倾向和欧美国家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利益，天平的任何一侧发生倾斜，都有可能导致苏联在中东地区实现进一步扩张，所以美国更希望《巴格达条约》不要成为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样的军事集团组织，而是仅保持其纸面效力，成为拦截苏联染指中东的屏障。但英国则希望能够维持其在中东的影响力和地位，建立一条沿“地中海到喜马拉雅山的”英国防线，所以尽管《巴格达条约》未能吸引其他中东国家加入，但英国需要“巴格达条约组织”成为中东地区的“北约”。⁶⁹ 因此，英美两国对“巴格达条约组织”的态度出现了极大分歧，双方都指责对方尝试在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大影响力，美国方面更是认为《巴格达条约》“已经背离了它的初衷”。⁷⁰ “巴格达条约组织”的建立本身就与美国“阿以和解”的战略目标相悖，毕竟阿拉伯世界不可能接受欧美国家企图将自己完全控制的“阴谋”。“巴格达条约组织”始一建立，便遭到了阿拉伯世界的强烈反对：埃及为了对抗巴格达条约组织，开始尝试建立阿拉伯世界的集体防务，在未来半年内，阿拉伯国家间相互签订了诸如“南层联盟”（Southern Tier）等多个双边或三边防御协定，组成了一个直接指向“巴格达条约组织”的中东防御同盟。与此同时，纳赛尔实行积极的中立政策，反对阿拉伯国家与大国结盟，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也趁机谴责巴格达条约组织的建立。美国企图调解阿以矛盾的出发点，反而进一步加剧了中东地区的敌对与冲突。

（三）苏联态度

在赫鲁晓夫任苏联领导人的两年里，冷战的氛围在整个世界弥散开来。前后短短几年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巴格达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等军事同盟条约组织相继建立，资本主义阵营企图通过串联一条沿西欧、中东、南亚、东南亚直到东亚地区的包围圈，将共产主义势力拦截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因此，与美国的“战略遏制”政策相对的，苏联将“战略突围”放在了这一时期外交方案的首要位置。

既然讲到突围，就必须存在一个突破口。综合各种因素而言，中东地区成为了这一突破口的最佳选择：第一，在地理位置上，中东位于上述“包围圈”的中心地带，一旦苏联能打通这一地区，包围圈将从地缘意义上被彻底切断；第二，随着英法等老牌殖民国家对中东地区影响力和控制力下降所产生的权力真空，使得自沙俄以来持续几百年的、染指中东诸国的目标有了实现的客观可能性；第三，苏联长期以来塑造的殖民地解放运动代言人形象，与中东在二战后兴起的去殖民化浪潮与民族解放运动的趋势不谋而合，这使得苏联有着和与中东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条件。基于以上观点，赫鲁晓夫提出了“和平地带”概念，苏联不再将奉

67 顾关福：《战后美苏关系的演变》，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第131页。

68 杜勒斯：《杜勒斯言论选集》，第562页。

69 Wm·Roger Louis, *Dulles, Suez, and the British* Richard H. Immerman, *John Foster Dulles and the Diplomacy of the Cold Wa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08.

70 *Ibid*, p.81.

行不结盟政策的国家视为资本主义阵营的前哨站，而是将其当作和平、独立的第三世界。⁷¹

而埃及更是苏联中东政策的重中之重。埃及的地理位置和苏伊士运河的重要地位自不必多谈，纳赛尔作为“不结盟运动”的重要领导者，奉行“与美国和苏联均保持一定距离”的中立外交政策，并在阿拉伯世界推行这一政策。这些都促使苏联在中东更多地关注埃及。

当然，美国也在通过一些手段，保证欧美国家在中东地区的控制权，以防止苏联渗透，1954-1956年间，美国与英国一道，提出了“阿尔法计划”和“欧米加计划”。阿尔法计划是一项关于阿以关系的计划，这项计划要求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结束彼此之间的战争状态，阿拉伯世界应当向以色列遣返难民，并解除对以色列的经济封锁，作为交换，以色列会适当放弃自己对争议地区的主权诉求，在这一基础上，以色列的边境及耶路撒冷会受到国际保护。而“欧米加计划”则是关于埃苏关系的计划，这一计划要求纳赛尔和其他中东国家领导人不得向苏联购买武器装备，并通过与西方合作实现阿以和解。⁷²不幸的是，两项计划并没有得到任何一方的支持，埃及不想因为和以色列议和而破坏自己在阿拉伯世界长期树立的形象，以色列则不可能接受把自己的领土和边境交给他人的事实。在1955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埃及军营进行了袭击后，埃及军方要求购买武器，以填补与以色列在军事实力对比上的鸿沟，“即使这意味着倒向社会主义阵营”。⁷³

在这种条件下，苏联认为这是发展苏埃关系新的契机。苏联外交部中近东国家司司长扎伊采夫（Г.Зайцев）如此评价这一时期的苏埃关系：“目前，埃及政府反殖民主义、抨击帝国主义军事联盟的立场，对苏、埃关系的继续发展是个利好消息。”⁷⁴1955年7月，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真理报》主编，也是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苏联的外交部长谢皮洛夫（Д.Т.Шепилов）出访中东。在访问埃及期间，谢皮洛夫促成了两国在武器交易方面的协议。依据协议，为了保证埃及的民族民主革命，苏联将从1955年9月开始对埃及提供武器援助。苏联在和埃及的合作上有着很明显的意图：通过军事援助手段，帮助中东地区摆脱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控制，同时尝试为阿拉伯世界增加一种武器来源上的选择。但显而易见，苏联无法立即通过和一个“不结盟运动”国家成为盟友，来加强自己在中东的地位：在谢皮洛夫与纳赛尔会面期间，他曾提出与埃及签署友好条约或互不侵犯条约的提议，但遭到了纳赛尔的拒绝。⁷⁵

为了进一步在中东地区实现本国战略，苏联展开了密集的外交攻势，1956年4月，苏联外交部发表了一份关于中东局势的声明，声明中严正强调了在中东地区组建、扩展军事集团的危险性。⁷⁶声明指出，“苏联政府有义务维护中东和平、保障中东国家独立自主。巴格达条约对此构成威胁，阿拉伯国家的反对立场是完全正当的，因为该条约为某些国家干涉中东国家内政创造了可能。”⁷⁷

（四）伊斯兰世界态度

1. 伊斯兰认同的反思与泛阿拉伯主义的发展

在讨论伊斯兰世界对于苏伊士运河危机的态度之前，有必要对近现代伊斯兰国家的政治认同的形成过程进行简要的讨论，这个过程中范围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一股浪潮就是“泛阿拉伯主义”。阿拉伯人最早生活在阿拉伯半岛上，以部落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在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后，阿拉伯人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到倭马亚王朝统治时期，阿拉伯人建立起了东自印度河，西至大西洋，横跨亚、非、欧三洲的庞大帝国。在这个过程中，阿拉伯族裔迁移到新征服的地域上，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也为北非、西亚的居民所接受，血缘、文化和宗教共同维系着帝国的政治认同。富庶的埃及、叙利亚和新月沃地甚至取代阿拉伯半岛，

71 罗伯特·唐纳森：《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得失》，任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269页。

72 Petersen. *The Middle East Between the Great Powers*, St.Martin Press, 2000, p.82.

73 杨冬燕：《苏伊士运河危机与英美关系》，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74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ф. 5, оп. 30, д. 123, л. 198.

75 АВП РФ, ф. 087, оп. 19, п. 39, д. 10, л. 41.

76 СССР и арабские страны 1917-1960 гг.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 Госю изд-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1, N 46, с. 133 - 135.

77 Ближневосточный конфликт: из документов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Ф. Т. 1. 1947 —1956. М.: изд-во “Материк” ,изд-во Йель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ША) , 2003, N 244, с. 406 - 407.

成为阿拉伯文明的新中心。阿巴斯王朝衰亡后，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版图永久性地碎片化，哈里发的权威持续衰退以至于沦为单纯的宗教领袖，以苏丹、埃米尔、贝伊等为称号的世俗统治者成为支配性的力量。另外，伊斯兰教早在阿拉伯帝国时期就已经分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两个主要派别，两派内部又会划分出许多小教派（例如什叶派就主要分为十二伊玛目派、五伊玛目派和七伊玛目派等），伊斯兰教的凝聚力大不如前。这种政治和宗教上四分五裂的局面一直持续到 15、16 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崛起。

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奥斯曼家族并非来自于阿拉伯族裔而是突厥族裔，信仰逊尼派中的哈乃斐派。在帝国早期，奥斯曼苏丹也只是伊斯兰世界众多世俗统治者中的一个，然而在苏丹塞利姆一世（Selim I the Grim）统治时期，奥斯曼帝国灭亡了叙利亚和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成功将伊斯兰教的三大圣地——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收入囊中。关键的是，奥斯曼军队还在埃及找到了马穆鲁克王朝的傀儡：哈里发穆塔瓦基勒（al-Mutawakkil），后来这位哈里发将自己的权力献给塞利姆及其继任者，从此奥斯曼苏丹就以哈里发的身份作为整个伊斯兰世界的领导者和守护者。⁷⁸ 在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帝国囊括了北非、黎凡特、伊拉克和阿拉伯半岛等旧阿拉伯帝国的主要领土，并同时 在政治和宗教领域统治着伊斯兰教逊尼派的世界。到了 19 世纪，奥斯曼帝国陷入长期衰落的局面，面临被欧洲列强瓜分的危险，同时，传统的伊斯兰教难以维系帝国内各族裔对帝国的认同，边境省份的离心力明显加强。19 世纪末“青年土耳其党”上台后，帝国彻底放弃了以宗教为主要认同的文化多元主义政策，开始推行“奥斯曼主义”，其实质就是以民族主义为认同建立突厥民族的土耳其国家。随着奥斯曼帝国的突厥化，伊斯兰世界再一次失去了统一的民族和宗教认同，成为权力的真空地带。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民族主义是伊斯兰世界各民族建立政权和进行国家建设时采用的主要手段。不仅奥斯曼帝国，什叶派的伊朗帝国也在巴列维王朝的统治下，放弃了数百年的政教合一政体，大刀阔斧地施行世俗化改革。其他在奥斯曼帝国的解体过程中独立出的政权也大都以民族主义为国家建设的主要认同（虽然或多或少具有宗教色彩），阿拉伯人的民族意识就是在这时期开始萌发。几个世纪里，阿拉伯人对于奥斯曼帝国统治的零星反抗此起彼伏，他们身为以自由民的身份出生的穆斯林，一直被排除在政府的高级职位之外。但是到了 18 世纪，地方的显贵们升入了奥斯曼行省行政体系的最高级，并被授予了“帕夏”称号。在阿拉伯世界，地方领袖的实力壮大开始挑战伊斯坦布尔的权威，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帕夏（Muhammad Ali Pasha）甚至可以完全无视苏丹的权威，几乎取得了独立的地位。19 世纪，呼吁回归先知和他的继任哈里发们的原初伊斯兰教、⁷⁹ 主张“认主独一”的瓦哈比派运动（Wahhabi Movement）与内志地区的沙特家族相结合，不仅席卷阿拉伯半岛，而且直接威胁到奥斯曼帝国在伊拉克和黎凡特的行省。奥斯曼帝国无力镇压以瓦哈比运动为旗帜的阿拉伯人反抗，只能依赖另一个阿拉伯行省——埃及的总督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进行镇压。

进入 20 世纪，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在奥斯曼的诸行省愈演愈烈，围绕着阿拉伯民族这一概念建立起统一的国家的思想已经出现，有人构想一个以阿拉伯半岛为中心的王国，还有人希望在叙利亚或伊拉克建立阿拉伯人的国家，这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在英法等国有着不小的影响。泛阿拉伯主义正是这一阶段阿拉伯民族运动蓬勃发展的直接产物。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本·阿里（Hussein bin Ali）是阿拉伯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在致信英国驻开罗高级专员麦克马洪（Henry MacMahon）时表示：“我的目标就是希望整个亚洲阿拉伯地区实现独立。”⁸⁰ 1914 年 11 月，奥斯曼帝国加入同盟国阵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苏丹仍希望利用宗教的影响力，以哈里发的身份向全球穆斯林号召对英法俄的“圣战”，并残酷镇压了叙利亚的阿拉伯民族运动。然而在战争之初英国就安排受它“保护”的埃及行省脱离奥斯曼帝国独立。1916 年，汉志地区的哈希姆家族领导的阿拉伯大起义彻底摧毁了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世界的统治，阿拉伯人配合协约国部队把土耳其军队赶出了巴勒斯坦、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战后，协约国背叛了它们的阿拉伯盟友，瓜分了奥斯曼帝国的政治遗产，法国得到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委任统治权，英国则控制了埃及、巴勒斯坦、伊拉克和波斯湾。

78 斯坦福·肖：《奥斯曼帝国》，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15 页。

79 尤金·罗根：《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 年至今》，157 页。

80 赵军、陈万里：《阿盟视角下的泛阿拉伯主义政治实践》，《世界民族》，2017 年 01 期，第 31 页。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阿拉伯民族运动在英法的殖民统治下继续蓬勃发展，并诞生了一批更激进的年轻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唾弃同殖民主义势力合作、维持君主制的一代民族主义政治家，展现出热情的革命共和主义，在军队中的年轻军官里很有影响力。同时，随着埃及、沙特、伊拉克等国相继获得名义上的独立，阿拉伯世界内部争论的焦点转向独立之后的统一问题，并逐渐形成了两派不同的观点。叙利亚、伊拉克和约旦等国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或阿拉伯联邦政府。埃及、沙特、黎巴嫩和也门等国则寻求建立一个主权国家合作机制，以加强阿拉伯各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合作。⁸¹ 二战的爆发沉重打击了英法两国在中东的存在，1942年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的一场晚宴上，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丘吉尔在场的情况下大谈：“殖民主义体系已经过时了，注定要灭亡。”并表示：“希望二战不久就能结束，并预见在战后，根据《大西洋宪章》的原则，摩洛哥将自由地获得独立。”⁸² 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的问题再一次被放在谈判桌上。

1942年伊拉克首相努里·赛义德(Nuri al-Said)向英国和阿拉伯各国发布了“蓝皮书”，提出了建立包括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外约旦、伊拉克在内的“新月形沃地”联邦的计划，在此基础上吸收愿意参加的其他阿拉伯国家，实现阿拉伯民族的统一。⁸³ 但是这一计划遭到埃及、沙特等国的强烈反对，最终化为泡影。埃及首相纳哈斯帕夏(Mustafa al-Nahas Pasha)随后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方案。1944年9月在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召开了旨在讨论未来的阿拉伯联盟的结构的会议，纳哈斯主持的筹备委员会起草了这次会议的议定书，并最终得到会议通过。次年三月，《亚历山大议定书》得到正式签署，阿拉伯国家联盟正式成立，阿拉伯人在争取独立和统一的道路上迈出了里程碑性的一步。⁸⁴ 根据《议定书》规定，阿拉伯联盟的任务是：监督缔约国贯彻执行协议条款举行定期会议以加强缔约国之间的关系；协调缔约国的政治路线以确保彼此间的合作，保护各自的独立和主权，以适当的方式反对一切侵略行为；全面管理阿拉伯国家的事务与利益。不难看出，《议定书》旨在保护成员国的独立和主权，而非阿拉伯政治统一。这也标志着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的计划基本破产，虽然后来在纳赛尔时期，埃及还曾经和叙利亚等国合作建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但是类似的尝试基本是失败的，而且在时间上也晚于本次会议的时间点。

2. 埃以冲突与伊斯兰国家：

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的构想大大地刺激了阿拉伯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早在1936年，纳哈斯帕夏就曾这样评论巴勒斯坦分治的构想：“我们也是阿拉伯人，埃及对一个犹太人的国家感到不安，……谁知道贪婪的犹太人下一个目标不是西奈？”⁸⁵ 1945年12月2日，阿拉伯联盟首次发出了要求对巴勒斯坦犹太人社区进行经济抵制的呼吁：“巴勒斯坦犹太人的产品在阿拉伯国家被视为不受欢迎的。鉴于它们在巴勒斯坦的生产可能招致犹太复国主义政治目标的实现，应该被禁止和抵制。”联合国召集一个由11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Special Committee on Palestine, UNSCOP)，该委员会以8:3的明显多数提议将巴勒斯坦地区划分为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国家(印度、伊朗、南斯拉夫三国反对)，该建议于1947年11月得到联大通过，即181号决议。在1947年，人口超过120万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仍占该地区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多数，而犹太人口仅约60万。很多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口占多数的城镇——如麦法(Maifa)等都被划入了犹太国；雅法名义上是阿拉伯国的一部分，实际上却是一块被犹太国包围的飞地。此外，阿拉伯人拥有巴勒斯坦全部土地面积的94%，以及全国全部可耕地面积的约80%，他们拒不承认联合国分裂其国家并将其中一半拱手送人的权利。⁸⁶

181号决议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都遭到了激烈的反对。唯一曾支持分治方案的阿拉伯国家就是外约旦，其国王是极度亲西方的哈希姆家族的阿卜杜拉(Abdullah I bin Al-Husseini)，在阿拉伯世界内部被普遍孤立，最终外约旦也在压力下加入了对犹太国家的军事行动。

81 赵军、陈万里：《阿盟视角下的泛阿拉伯主义政治实践》，《世界民族》，2017年01期，第32页。

82 尤金·罗根：《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年至今》，585页。

83 杨增耀：《“大叙利亚计划”的昔与今》，《阿拉伯世界》，1988年04期，第66页。

84 Keith Kyle, *Suez: Britain's End of Empire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I.B. Tauris, 2011, p. 20.

85 赵军：《埃及与阿盟的互动关系研究》，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年09期，第96页。

86 尤金·罗根：《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年至今》，515页。

以色列甫一建国，就同毗邻的四个阿拉伯国家，即埃及、外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之间发生了军事冲突（伊拉克也加入进来），阿拉伯国家将“四支没有统一的指挥，没有协同一致的目标，没有坚定而持久的取胜意志的部队”投入了战场去对抗按现代化方式进行了人力总动员的以色列人。⁸⁷ 尽管这次军事行动得到了阿盟的协调，并且打着“恢复法律和秩序，防止巴勒斯坦境内的动乱蔓延到其领土，并制止进一步的流血”的旗号，但是阿拉伯国家内部勾心斗角，它们不仅不承认犹太国的政权，甚至无法就承认哪个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政权达成一致。阿拉伯人原本在战争中占据优势，然而却因为缺乏统一指挥等自身原因和联合国的干涉失去了战机，将主动权拱手送给以军。迫于军事上的重大失败，除了伊拉克以外，其他的阿拉伯国家都在国际调停下先后与以色列停战（伊拉克至今没有承认以色列并一直处于对该政权的战争状态）。

通过这次战争，以色列占领了原属阿拉伯国家的加利利地区和原定联合国托管的耶路撒冷西区，72.5 万巴勒斯坦人因为战争沦为难民。阿以战争、以色列政府对阿拉伯居民的驱逐政策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恐怖行动造成上百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流离失所。时任以色列外长摩西·夏里特（Moshe Sharett）在私人信件中宣称：“当代巴勒斯坦历史中最壮丽的事件就是对阿拉伯人的大规模驱离……某种程度上比犹太之国的建立更加壮丽。”⁸⁸ 巴勒斯坦同胞的遭遇使分裂的阿拉伯各国团结起来，而且使许多阿拉伯政治家（包括纳赛尔）意识到，英法既没有意愿也缺乏能力解决巴以冲突，阿拉伯人需要寻找新的朋友。

1950 年 4 月 13 日，阿盟在开罗签署了《联合防御和经济合作条约》，试图通过建立集体安全机制维护阿拉伯世界的和平、共同对付以色列的侵略，规定在战争爆发的情况下，除经各国一致同意另选司令外，应将联合部队最高指挥权授予在战地行动中拥有最大军事部队的缔约国。然而此时，阿拉伯国家在利益上的分歧已经显然改过了它们由血缘和文化认同激发的团结意识，埃及和伊拉克为两个区域大国激烈争夺对联盟的领导权。特别是美国的介入和美苏冷战，更是加剧了阿拉伯国家间的分裂局面。1950 年 5 月 25 日，美英法三国发表“三方宣言”（Tripartite Declaration），承认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都需要保持“一定程度的”武力以维持国内治安、自卫和集体地区防卫。美国意图通过这次宣言缓和阿以矛盾，避免中东地区的局势恶化以给苏联以干涉的机会，并在未来将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纳入美国在中东反苏的集体安全机制中。⁸⁹ 美国认为，为了有效地抵御苏联的扩张，中东地区就应该像西欧那样组成地区性同盟。它坚决反对阿拉伯国家在美苏冷战中保持中立，主张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必须反对中立……团结在一起”。如果在世界范围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接受中立主义的话，那将是一种异教邪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 1955 年的演讲中说：“美国不相信中立。……中立是一个已废弃的概念，它就好像让每个社区摒绝警察一样。”因此，美国积极在中东拼凑包围苏联、抑制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联盟体系。⁹⁰

然而纳赛尔并不信任美国，他认为美国只是试图取代英法在中东的地位、试图以殖民主义的手段控制中东的阴谋家。纳赛尔认为“共产主义可能是危险的，但帝国主义更危险”，奉行不结盟的中立政策成为 20 世纪后半叶影响最深远的政治运动——“不结盟运动”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之一。美国几经尝试后放弃了以埃及为中心构建中东反苏同盟的念头，转而提出了组建一个由土耳其、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参加的“北层联盟”（Northern Tier）的主张，这些国家的政治家不像纳赛尔那样反感西方、崇尚中立，在地缘上也更直接地感受到了来自苏联的威胁。1955 年 2 月，土耳其和伊拉克在美国的斡旋下签订了互助合作条约，即所谓的“巴格达条约”（Baghdad Pact）。巴基斯坦、伊朗和英国后来也加入进来，形成了巴格达条约组织，一个被寄予了“成长为中东的一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厚望的组织。从此埃及和伊拉克两个泛阿拉伯主义的领导者彻底分道扬镳，《联合防御和经济合作条约》也再没有发挥过实际作用。纳赛尔领导下的埃及试图打破阿盟这种“联”而不“盟”的局面，高举泛阿拉伯主义大旗，通过占据阿拉伯民族道义制高点锻造出纳赛尔“阿拉伯雄狮”“当代萨拉丁”

87 亨利·卡坦：《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以色列》，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 73 页。

88 Keith Kyle, *Suez: Britain's End of Empire in the Middle East*, p. 22.

89 Keith Kyle, *Suez: Britain's End of Empire in the Middle East*, p. 36.

90 杨冬燕：《巴格达条约的形成及其对中东的影响——英美在中东的矛盾与争夺》，《南京大学学报》，2001 年 02 期，第 62 页。

等阿拉伯民族英雄的形象，并试图瓦解巴格达条约组织。⁹¹

埃及鲜明的立场和以色列对阿拉伯民族的蔑视态度使得因为巴格达条约组织的建立而分裂的阿拉伯世界在埃以冲突上清一色地站在支持埃及的立场上，约旦、叙利亚、沙特等较有影响力的阿拉伯国家，甚至是埃及的对手伊拉克都纷纷支持埃及。苏伊士运河战争期间，阿拉伯各国表现出空前的团结：“叙利亚和沙特与英法断交，约旦与法国断交，三国都宣布总动员，准备出兵参战；沙特停止向英法供应石油，叙利亚和约旦切断了境内的油管，使其不能从伊拉克向欧洲输送原油，利比亚虽然和英国结盟，但不准英国把他作为进攻埃及的基地。”⁹²阿盟不仅支持埃及的国有化政策，还激烈地反对英法对于苏伊士运河的侵略。运河危机期间各国阿拉伯民族情绪的高涨使纳赛尔看到了泛阿拉伯主义的未来。

除了阿拉伯国家以外，土耳其和伊朗也是伊斯兰世界里不可忽视的力量。早在奥斯曼帝国时期，犹太人就作为“有经人”在帝国境内享受较宽松的生活条件，共和国时期土耳其延续了对犹太人的友善态度，一度成为欧洲犹太人逃离纳粹屠杀的重要窗口。巴以分治方案提出后，土耳其曾经反对该决议，因为当时犹太人建国得到了土耳其最大的威胁——苏联的支持，土耳其担心以色列将是苏联在中东扶植的共产主义代理政权。但是美以关系的发展表明以色列并不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因此在 1949 年 3 月 24 日，土耳其率先承认以色列并与其建交。1955 年土耳其加入美国设计的中东反苏共同防御机制，同伊拉克签署巴格达条约，在阿拉伯国家中引起轩然大波，纳赛尔尤其反对这一条约。为了吸引其他阿拉伯国家加入该组织，土耳其政府称土以关系是微不足道的，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后更是谴责以色列是对中东和平的最大威胁。1956 年 11 月 26 日土耳其外交部宣布召回土耳其驻以色列公使。12 月 19 日，两国外交关系降到代办级。⁹³但是这只是土以两国为了避免激怒阿拉伯国家和苏联而采取的外交姿态，两国依然隐蔽地保持着联系与合作，1958 年两国就秘密签署协议，共同对抗来自苏联和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国家的威胁。伊朗和以色列的关系源远流长，古波斯帝国在灭亡新巴比伦帝国后曾允许被巴比伦羁押的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以色列建国后，伊朗在关系以色列核心利益的犹太移民问题上大开“绿灯”，以色列曾经以伊朗为中转站将伊拉克的犹太人送往以色列。虽然受到国内宗教保守势力的反对，作为非阿拉伯国家的伊朗对以色列保有一定同情，在阿以冲突中置身事外，并在 1950 年事实上承认了以色列国。⁹⁴在法鲁克王朝时期，埃及和伊朗也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法鲁克王朝还和巴列维王朝有王室联姻关系。但是法鲁克王朝被“自由军官组织”推翻后，埃及作为泛阿拉伯运动的领导者致力于维护阿拉伯国家在波斯湾的利益，同伊朗关系转冷。后来，伊朗也加入了巴格达条约组织。在五十年代泛阿拉伯主义运动高涨的背景下，伊朗以色列两国达成了对抗阿拉伯国家的长达近 30 年的秘密战略联盟关系。

三、美苏对危机的介入

（一）美国

在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后，作为有重要经济利益的直接当事国的英法两国主张通过武力“惩罚”纳赛尔，但美国更倾向于以和平方式解决英法与埃及之间的矛盾。美国并不希望欧美国家的经济利益因为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而受损，但也不希望被阿拉伯世界树立成“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盟友，让纳赛尔进一步强化自己的意见领袖形象。除此之外，美国还有着诸多顾虑：担心以色列的介入会使得自己长期施加的，在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影响力将会消失殆尽，同时，一旦英法对埃及动武，或是以上所说的任何一种情况出现，苏联必将趁虚而入，坐享渔翁之利，甚至存在直接进行军事援助的可能性。美国需要在多种利益冲突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而避免战争发生则是尝试寻求这种平衡的唯一途径。⁹⁵

91 赵军：《埃及与阿盟的互动关系研究》，第 99 页。

92 吴秋敏：《纳赛尔时期埃及对阿盟政策的探析》，《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 年 01 期，第 79 页。

93 雷钰、黄民兴等：《列国志（新版）·以色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版，第 294 页。

94 同上，第 291-292 页。

95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United Kingdo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27 July, 1956, *FRUS*,

同时，从美国国内的角度看，公众舆论也是影响当前外交政策和制约外交政策实施的重要因素，1956 年是美国的大选年，而在大选年使用武力所导致的政治风波的结果是无法预测的，因此，政府应对危机的策略不应在此时与公众和舆论的要求相左。美国的公众舆论普遍认为，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不会对群众生活产生很大影响，而且这一问题和英法等欧洲国家的相关性更大，所以不应当对如此之远的苏伊士运河地区动武，而是应当通过调解从而避免任何军事压力。⁹⁶ 因此，除了美国自身的外交战略考量外，国内舆论环境也成为了引导美国进行和平努力的重要因素。

在艾森豪威尔针对纳赛尔对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行动发表的声明中，除了表达对局势的关注外，并未具体指明美国所持立场和进一步措施。1956 年 8 月 1 日，杜勒斯访问伦敦，其间，杜勒斯表示，为了避免苏联干涉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反感，英法不应贸然行事。但杜勒斯也表示，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这一事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纳赛尔组建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长期计划的组成部分，而国有化的确对这一地区的政治平衡和西方的切实利益造成了损害，所以必须让纳赛尔“吐出他咽下的脏物”。⁹⁷ 杜勒斯提议，以 1888 年《君士坦丁堡公约》为基础，召开一个国际会议，讨论苏伊士运河管理的国际化机制，与会国家包括 1888《君士坦丁堡公约》的八个签字国，和 16 个贸易量名次靠前的国家。尽管英国对于苏联的参与，以及此次会议的前景和成果表示了质疑，但由于并未做好军事介入的准备，所以还是同意了美方的提议。

8 月 16 日，第一次伦敦会议召开，杜勒斯在会议中表示，应当建立一个与联合国保持联系的，进行运河管理的权威机构，以恢复对运河有需求国家的信心。经过紧张激烈的讨论，会议达成关于苏伊士运河国际监管和运营的《十八国宣言》，宣言承认埃及在运河及其运营上的一切合法权利，但是表示运河的运营应当与国家政治影响相分离。同时，除了在依据 1888 年《君士坦丁堡公约》的原则的基础上，自由、安全、有效地经营运河外，还提议依照这些原则商谈一个新条约，这一新条约将承认埃及的主权，同时建立一个由所有运河使用国组成的委员会监督苏伊士运河的管理。⁹⁸ 随后，宣言签署国一致决定，派遣时任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罗伯特·孟席斯率领一个包含五个签署国在内的代表团前往开罗，将《十八国宣言》转达给纳赛尔，要求其接受这一宣言，并说服其遵守宣言各项原则。纳赛尔认为，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是主权行为，不应该受到其他国家的干涉，但纳赛尔也向孟席斯承诺，苏伊士运河在未来将会提升技术与效率，航行自由，使用不受政治立场干扰，且合理收取通行费用。但由于英法两国坚持认为孟席斯代表团无权与纳赛尔对《十八国宣言》的内容进行进一步商讨，因此埃及拒绝了《十八国宣言》并通过与苏联合作，采取了保障苏伊士运河顺利通航的预防性措施。

英美的本意，就是希望借着纳赛尔拒绝国际斡旋的东风，可以以此为由直接进行军事干涉，但美国始终没有放弃避免战争出现的努力。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继续以中东影响力和社会主义阵营这两个理由，强迫英法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争端。艾森豪威尔依旧希望通过和平手段解决苏伊士争端，他建议实行额外的经济制裁，利用阿拉伯对抗减少对运河过境的依赖。9 月 12 日，三国依照杜勒斯的建议，提出了建立“苏伊士运河使用协会”的主张，围绕这一主张，第二轮伦敦会议于 9 月 19 日召开。为了避免英法将这一问题提交联合国或直接付诸武力解决，美国建议依照 1888《君士坦丁堡公约》的自由通航权，建立一个不在埃及境内，也无需埃及政府授权的机构。协会依据运河使用国的意愿自行雇用领航员、组织护航队，并向埃及支付报酬。协会最终成功建立，但与会各国对于运河使用费、是否同埃及达成运河管理使用协议问题上存在极大分歧，对于是否加入组织也持保留意见，这也决定了协会悲剧的命运。

9 月 24 日，两次伦敦会议带来的失望结果使得英法决定绕开美国将苏伊士运河问题提交联合国。这也使得英法两国和美国的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上相左的立场被真正摆上台面：英法

1955-1957, Vol.16, p.28.

96 杨冬燕：《苏伊士运河危机与英美关系》，第 81 页。

97 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19d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Washington, August 9, 1956, *FRUS, 1955-1957*, Vol.16, p.167.

98 Document SUEZ/56V/2 and amendments, in Department of State, *SUEZ*, pp.77-78.

虽然对埃及的控制有所松动，但这并没有改变在中东一贯强硬的殖民主义政策，而是使他们尝试在阿拉伯世界寻找新的封建傀儡，所以英法并不介意在任何时候通过武力解决问题；但美国为了树立独特的领导者形象，并未选择再走殖民主义路线，而是在保证西方整体利益的情况下，在中东两个敌对世界之间寻求平衡，所以美国的想法是把武力作为“没有办法的办法”，通过这种最后手段来寻求和平办法。根本立场的不同使得两国之间的外交出现了严重障碍，在长达两个月的磋商后，国际斡旋没有任何进展，美国对英法将问题诉诸联合国的真正目的毫不知情，对于英法是否真的想和平解决苏伊士运河危机也并不肯定，与此同时，英国的判断也由于杜勒斯在外交过程中的表态受到了误导，英国认为美国模棱两可的立场，是在向他们暗示美国会支持他们的行动，英国政府普遍认为美国尽管勉强，但诸如“让纳赛尔吐出他口中的脏物”这些话表明美国至少会容忍英国未来可能实行的军事行动，甚至会在某一天完全赞同英国的观点。⁹⁹

10月9日，英、法、埃在联合国秘书长的主持下达成了六项原则协议。¹⁰⁰¹⁰¹六项原则协议得到了安理会理事国一致赞同，但英国认为，只有对运河实现国际共管，埃及才不会再以运河为要挟，服务自己的政治目的，因此，英法两国在13日向安理会提出了新的提案，新的天在原有的六项原则的基础上，又添加了对苏伊士运河进行国际共管的内容。六项原则在安理会得以通过，而国际共管提案由于苏联的否决而未能通过。随后英法认识到难以通过外交手段压服埃及，开始避开美国暗中勾结以色列准备对埃及发动一场军事进攻，并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

在长达数月的应对危机的斡旋过程中，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始终在寻找一种和平解决危机并阻止纳赛尔成功地将运河收归国有的办法，他们希望一点点说服英国，但最后既没有得到中东国家的支持，也破坏了传统盟友英法之间的关系。在美国的“摇摆不定”、英法的“胆大妄为”、埃及的“不畏强权”之下，苏伊士运河危机逐步演变成了一场战争。¹⁰²

在战争爆发后，艾森豪威尔在全国电视讲话上对英法的侵略行径表示了强烈的谴责，表示这是在联合国框架外的行动。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美国确定了他们在战争爆发后的立场：美国需要成为反殖民世界的领袖，通过这种手段增加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同时避免苏联通过令人信服的表现获取这一世界的领导权。¹⁰³11月2日，美国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了一项决议，随后，联大通过了美国提出的997号决议，埃及宣布接受这一停火决议，但英法两国对此表示拒绝。为了使英法两国尽快停火，艾森豪威尔牵头采取了多项措施。首先，艾森豪威尔提出了多项建议，包括在联合国框架内实现停火，联合国应当暂停对交战国运送必要物品等；随后，艾森豪威尔还准备还对英国在经济方面施压，美国以不再维持英镑相威胁，同时还表示美国的财政援助只有在英国接受停火协议才会予以考虑，他认为，发动这场战争的人应该自己解决自己的石油问题，“让他们在自己的石油中翻腾”。¹⁰⁴持续几天的军事冲突并未使英国对中东局势产生好的预期，经济危机、石油危机和可能的苏联威胁，使得英国被迫在11月6日接受了联合国的停火协议，随后法国和以色列也接受了这一决议。同日，艾森豪威尔在美国大选中获胜，随后，他对英国驻美大使表示，英国应当首先考虑的是撤军而不是和埃及谈判，因为这样无论如何苏联会始终支持埃及，对英法的援助将会建立在两国开始撤军这一基础上；也只有在这个开始撤军前提下，美国才可以同阿拉伯国家谈话，

99 哈罗德·麦克米伦：《麦克米伦回忆录(4)：乘风破浪》，余航，杜汝辑，杨德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9页。

100 六项原则包括：1、保持运河通航自由，不得有任何歧视；2、埃及主权应予尊重；3、任何国家的政治不得影响运河的管理；4、运河通行税费问题应由埃及与使用国通过协议确定；5、通行费中应有合理的比例作为发展之用；6、埃及政府与使用国之间的争端或异议未能及时解决的应提交仲裁解决。

101 Editorial Note, October 5, 1956, FRUS, 1955-1957, Vol. 16, p. 712.

102 FRUS, 1955-1957: *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300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Washington, October 12, 1956*, PP. 701-704.

103 Nigal John Ashton, *Eisenhower, MacMillan and the Problem of Nasser: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and Arab Nationalism, 1955-1959*, London: Martin's, 1996, p. 97.

104 Peter L. Hahn, *The United States, Great Britain, and Egypt, 1945-1956: Strategy and Diplomacy in the Early Cold War*, (Chapel Hill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1), p. 235.

尝试让阿拉伯国家改变对西欧石油规定所持的态度，随后再具体讨论对英国的资金援助。¹⁰⁵与此同时，美国也对苏联支持埃及的宣传和外交行动提出了严正警告，并向苏联表示，苏联任何的直接干预行动都会导致美国的强烈反应，因此苏联也大幅度削减了对埃及的支持。在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之下，英法已经没有选择，不得不从埃及撤军，1957年3月1日，以色列军队最后从埃及全部撤出。

尽管美国成功取代了英国在中东地区国际政治的主导地位，但也付出了疏远英法等盟国的代价。在英法接受停火决议并宣布从埃及撤军后，美国立即向英国运送急需的石油，为了支持英镑的地位，美国还提供了数亿美元贷款。同时，为了抵消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后纳赛尔在中东地区树立的领袖形象，美国阿拉伯世界宗教圣地——沙特阿拉伯作为“前哨站”。沙特阿拉伯的政体与纳赛尔提出的推翻中东地区所有的君主制政权明显相悖，同时沙特阿拉伯还有着极其丰富的石油资源，美国利用这些特征，企图抵消纳赛尔在中东地区的影响。美国在成为主导者后，一改危机前中间人的形象，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中东事务中，1957年1月，艾森豪威尔提出了“艾森豪威尔主义”，即要求授权总统今后除了为中东提供共同安全计划以外，还有权在1958—1959年财政年度中每年自由支配中东的2亿美元款项。¹⁰⁶

回顾美国在本次事件中的态度和决策，美国为了保持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之间的影响力与遏制苏联渗透，不得不维持这种奇妙的中立。无论是在危机爆发前还是危机爆发后，美国对中东政策都没有跳出对苏联一贯采取的“遏制模式”。美国政府始终认为，如果不保持这种“公正”而是偏向任何一方，最后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共产主义在中东的渗透和传播。总结而言，美国的决策对英美特殊关系做出了一定牺牲，有地缘政治下的特殊原因，但总体上并没有跳脱出冷战的整体环境。

（二）苏联

美苏在围绕埃及进行对抗的一个实例，也是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的铺垫，就是美苏与埃及在阿斯旺大坝的贷款风波。阿斯旺大坝的建设对埃及与非洲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按照阿斯旺大坝的设计，可以有效地扩大埃及的农耕面积，为非洲地区提供充足的电力资源，大幅度提升埃及的工农业水平，以满足埃及的日益增长人口的需要。除此之外，纳赛尔还把阿斯旺大坝比作埃及“新时代的金字塔”，是埃及民族觉醒，摆脱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象征。按照水坝的建造计划，整个工程总计需要13亿美元的款项，然而埃及财政问题严重，外汇储备短缺，埃及不可能自己承担这笔巨款，所以不得不寻求国外援助。¹⁰⁷

在计划初期，纳赛尔曾多次向西方国家寻求援助，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对计划进行充分评估后，认为阿斯旺大坝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对于其建设工程的复杂性与庞大的款项望而却步。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已经成为苏联外长的谢皮洛夫再次访问埃及。在访问中，他向纳赛尔提出了一揽子优惠政策，包括向埃及提供4亿美元为期60年的无息贷款，免除之前达成的武器援助协议的剩余款项，使用英镑向埃及购买棉花，出资在埃及建立新的钢铁厂等等，这一计划得到了纳赛尔的肯定。¹⁰⁸

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美英一致认为，如果让苏联在大坝项目上继续得利，那么苏联就会借着对埃及进行武器援助的东风，彻底把手伸入中东地区，所以必须对埃及的阿斯旺大坝工程提供援助。随后，西方世界相继承诺向埃及提供贷款，用于水坝一期工程。但西方的贷款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要求埃及把水坝建设作为其发展纲领的中心，每年需要将固定比例的财政收入用于这一工程，并且不能再接受其他国家的贷款以及来自共产主义国家的援助。¹⁰⁹

然而随后，埃及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表示随时接受苏联对水坝提供援助的建议。国际援助来源的多元化对埃及而言百利而无一害，但资本主义阵营并不会接受埃及在阿斯旺

105 Telegram From the Mission at the United Nations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November 7, 1956, FRUS, 1955 ~ 1957, XVI, p. 1058.

106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 1957,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1, pp. 783-790.

107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 1957, p. 603-604.

108 Allen W. Dulles to John F. Dulles, June 17, 1956, FRUS, 1956, Vol. 15, pp. 751-754.

109 安东尼·纳丁：《纳赛尔》，范语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577页。

大坝工程上接受来自西方以外国家的援助。¹¹⁰7月19日，美国宣布取消向水坝工程提供贷款的承诺，随后英国也宣布撤回对大坝工程的援助，政策受制于美英两国的世界银行的贷款允诺也随之取消。正因如此，纳赛尔随后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

对于苏联而言，支持纳赛尔政府，是扩大苏联在第三世界影响的有效途径，扩张在中东和非洲的势力范围，实现对以上地区的影响，从而实现“战略突围”的战略目标。因此，赫鲁晓夫一改斯大林时期“自我封闭”的外交政策，将战略突围的主要目标与苏联的国家安全绑定在一起，以尝试破解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政策以及苏联国际影响力下降的不利局面。然而，苏联也有自身的顾虑，由于在这一时间段，苏联还没有与美国进行争霸的硬实力，所以不得不避免与美国直接展开正面冲突，而是选择不深入美国势力范围，不与美国直接冲突的情况下，用政治、外交、经济援助等手段，间接地介入到那些尝试脱离西方殖民主义势力范围的国家，进行苏联式的“和平渗透”。¹¹¹

苏联表达了想要和平解决苏伊士运河危机的愿望。8月1日，赫鲁晓夫在庆祝列宁体育馆建成的仪式上公开表示，埃及的行动完全在其权力范围内，并不违反国际法，而且从保证苏伊士运河自由通航权的角度看，西方的利益也没有遭到破坏。¹¹²依据苏联政府1956年8月9日发表的声明，苏联承认船只在苏伊士运河自由航行的重要性，但认为埃及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权利来源于其国家主权，任何国际组织都无权对其强加干预。¹¹³8月12日，苏联外长谢皮洛夫致电苏联驻埃及大使基谢廖夫(Е.Д.Киселев)，他向基谢廖夫强调：“我们的立场是，现在必须采取措施来缓和因苏伊士运河事件而出现的紧张国际局势。这符合埃及人民、全人类的和平安全利益。”¹¹⁴

在第一次伦敦会议中，谢皮洛夫对会议提出了两点基本原则：第一，会议不能沿着殖民主义的方向进行，应以确保航行自由、尊敬埃及不可剥夺的权利为原则；第二苏伊士运河管理方案应建立在符合埃及法律，兼顾其他运河使用国利益的基础之上。同时，谢皮洛夫直接表示，杜勒斯在会议上所提出的“杜勒斯方案”，本质上是一个殖民注意方案，对于解决苏伊士运河问题没有任何实际意义。¹¹⁵在对《十八国宣言》进行投票时，苏联投出反对票。在埃及正式拒绝了《十八国宣言》后，苏联和埃及达成另一方面的合作，以保证苏伊士运河在脱离西方支持下依然能顺利通航。9月1日，苏联挑选了23个领航员，并将在短期内在列宁格勒、敖德萨等地再挑选30个领航员。9月14日，西方领航员依照苏伊士运河公司的指示离开工作岗位，来自苏联等国的领航员迅速结题了他们的职位，以避免造成运河瘫痪。¹¹⁶

苏联明确反对对苏伊士运河进行国际管理的计划，同时反对英美等国将《十八国宣言》强加给纳赛尔。9月15日，苏联发表了强烈谴责英法针对埃及进行军事准备的声明，声明中指出，考虑到目前的局势，苏联不能对因西方行为而造成的混乱袖手旁观，苏联将尽全力通过协商公正地解决苏伊士运河问题。¹¹⁷在安理会对苏伊士运河问题进行讨论的过程中，谢皮洛夫收到了来自莫斯科的电报，苏联政府向他强调，应当重申埃及对苏伊士运河的主权，必须要求苏联放弃对纳赛尔进行“最后通牒”式的要求，要在会议中引导西方抛弃过去的强硬立场，通过相互妥协和平解决问题，以此制约英法的军事行动。¹¹⁸随后，10月8日，谢皮洛夫在安理会上进行发言，他表示英法提出的国际共管提案是“最不想使苏伊士运河问题得到积极解决的”，这一提案严重违背了联合国宗旨，完全不可以被安理会所接受。¹¹⁹对此，

110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国际事务概览（1955—1956）》，上海市政协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387页。

111 顾关福：《战后美苏关系的演变》，第19页。

112 *Department of State, Central Files*, 974.7301/8-156.

113 СССР и арабские страны 1917 - 1960 гг., N 52, с. 145 - 151; N 60, с. 190.

114 Ближневосточный конфликт, т. 1, N 276, с. 477.

115 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Soviet Embassy, London, August 18, 1956, *FRUS, 1955-1957*, Vol.16, p.225.

116 АВП РФ, ф. 087, он. 19, п. 38, д. 030, л. 54.

117 富尔先科，纳夫塔利：《赫鲁晓夫的冷战——一个美国对手的内幕故事》，王立平译，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6页。

118 Ближневосточный конфликт, т. 1, N 297, с. 513 -516.

119 国际关系研究所编：《中东问题文件汇编 1945—1958》，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260页。

谢皮洛夫提出了苏联对于和平解决苏伊士运河问题的四项基本原则：一切航行自由；埃及对苏伊士运河的主权不可侵犯；不得破坏运河设施；建立适当的国际合作形式。在对国际共管提案进行投票时，苏联投出反对票，使得这一提案遭到一票否决。

随后，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此时，苏联正陷于匈牙利地区的泥潭，但英法对埃及的军事行动，不仅使得国际社会的实现从东欧迅速转移到了中东地区，还为苏联提供了真正成为第三世界领导者的契机。为了打赢舆论战争，扩大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苏联展开了大幅度的外交攻势。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谢皮洛夫发表声明，对英法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国对这一行为的纵容表达了强烈的谴责，几个国家政府的行为严重违背了联合国的原则和宗旨，破坏了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使命和义务，是对埃及的侵略。11月5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致信美、英、法、以四国领导人，布尔加宁建议在联合国框架内，由苏联参与进行联合军事干预，在遭到了美国一口回绝后，布尔加宁对参战三国领导人发出了最后通牒，暗示如果三国如不立即停止军事行动，苏联将对三国部队进行火箭打击。布尔加宁发给时任英国首相艾登的信中写道，“如果遭到一个拥有各种大规模毁灭武器的大国进攻，英国将处于何种境地？这个国家无需向英国派遣海军和空军，只要拿出火箭即可。”¹²⁰ 在给以色列的信中，布尔加宁严厉谴责了以色列的行动，并威胁要召回苏联驻以大使。11月6日，联合国达成要求英法两国停火的决议。11月10日，塔斯社发表声明，表示如果英、法、以依旧无视联合国决议，拒不从埃及撤军，并依旧蓄谋对埃及使用武力，无数的苏联志愿者将涌入埃及，参加这场埃及人民独立的斗争。¹²¹ 在以上外交行动遭到了美国的严重警告后，由于担心危机进一步升级导致苏联真的被卷入战争，苏联减少了对埃及的物质支援，并完全转向了舆论领域。随后英法以三国分别于12月21日、1957年3月8日完成从埃及的撤军。

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苏联成功运用这次事件，将西方的注意力从局势混乱的波兰和匈牙利转移开来，还使得美欧之间长久以来的特殊关系遭到了破坏。不仅如此，苏联实现了他们最重要的目的——避免资本主义阵营通过中东构建包围圈。苏伊士运河危机后，苏埃友好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苏联继续对阿斯旺大坝工程进行援助，直到第四次中东战争时，埃及军队的全部装备都由苏联提供。借助埃及这块“敲门砖”，苏联将势力深入到伊拉克、叙利亚等中东国家，在外交、内政、经济等领域帮助阿拉伯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实现民族振兴的同时，也成功使得中东地区成了自己与美国在第三世界展开争夺的根据地。

（三）总结

美苏两国围绕埃及展开的博弈贯穿了苏伊士运河危机的始终，尽管两国持有不同的立场，采取了不同的手段，但总体上，在主张和平解决苏伊士运河问题这一点上有着相似性。主要原因在于美苏都意识到了第三世界国家崛起的现实情况和殖民主义的落后与局限，且两国都与英法不同，两国并不依赖苏伊士运河所产生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这些利益对自己的盟友而言非常重要，但又不与自己直接相关，两国只是尝试通过苏伊士运河危机，获得在中东地区的主导权。主张和平解决，也只是两国为了保持自己与埃及的关系，维持或扩大自己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一种方式 and 手段。

四、战争状态的暂时结束与后续影响

（一）战争的暂时结束

战争爆发后，英国国内的经济压力和反战浪潮都逐渐直接作用于英国政府的决策，而在此基础之上美苏对于局势的介入与联合国的相应作为（此部分内容将在二轮学术文件中单独进行详细阐述）也使得整个局势从最开始简单的英法以同盟行动演化为了一个国际事件。此时的英国国内民意分歧十分激烈，许多民众对于首相选择的战争行为十分不解，尤其是许多

¹²⁰ СССР и арабские страны 1917 - 1960 гг., N 81, с. 267 - 259.

¹²¹ *Ibid.*, с. 264 - 266.

本应支持首相的民众已经逐渐失去了对纳赛尔转化苏伊士运河为国有的愤怒之情，工党也借机举行了抗议活动以攻击保守党政府。除此之外，英国的行为也遭到了美国所施加的财政压力，美国人的威胁与英国政府四处求援未果，恶化了能源问题上已经因苏伊士运河无法使用而陷入的尴尬局面，英国政府在此时也不得不考虑可能面临的外汇问题以及能源危机。

在舆论和经济压力之下，又考虑到美苏所施加的压力，英国政府方面不得不就政治和经济危机做出妥协。英国首相于 11 月 6 日宣布停火，据称当塞得港的部队接到命令时，其本可以在 24 小时内控制苏伊士运河，¹²² 而法国和以色列方面也没有事先得到警告。

英国宣布停火以后，对此决定十分不满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也选择了接受，其后英法选择了在 1956 年 12 月 22 日前撤军，由联合国紧急部队中的丹麦和哥伦比亚部队取代其位置。¹²³

相对应的，以色列于 1957 年 3 月离开了西奈半岛，但拒绝有任何联合国部队在其控制区驻扎。除此之外，以色列部队对西奈半岛的各类基础设施进行了有计划的破坏。¹²⁴

（二）后续影响

苏伊士运河的危机，令埃及与以色列意识到对方是自己在地区内的最大安全威胁，使两国进一步走向对抗；而这场危机对于英法来说，则是一次错误估计自己与美苏间的力量对比、仍用传统列强思维处理危机的惨痛失败，在此之后，两国不得不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定位和角色，调整或制定新的对外政策；最后，这一冷战史中的重大事件，也对美苏为核心的世界局势，中东地区安全问题的后续发展，以及整个国际体系秩序的演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对于美苏来说，二者从客观上通过自身对于局势的介入而主导了整个苏伊士运河危机的走向，也借此影响到了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虽然结果可能因其他影响而不是尽如人意，但美苏也通过此次经历开始更多也更主动地介入了其他的地区问题，开启了日后为人们所熟悉的冷战之中的局部冲突模式。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事件之后苏联在中东的影响力得到了巨大的提升，而赫鲁晓夫本人也十分满足于其利用核武器进行胁迫和欺诈的手段。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其也在此次事件之后经过国会获得了更多在中东开展行动的授权与资金，希望以此来更好地介入中东局势以及防止苏联的扩张。

而对于英法来说，其所受到最明显的影响就在于此次苏伊士运河危机直接冲击了两国对于自身殖民地的控制，而压力下的停战也使得其必须重新审视自身是否可以维持二战以前的殖民帝国和世界霸主的地位，反思其在二战以后的外交模式与在盟友上的选择。从这些角度上来说，再加以失去苏伊士运河所带来的经济以及能源安全上的新挑战，苏伊士运河危机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世界范围内，尤其是英法殖民地的非殖民化进程。而在审视与反思的过程之中，英美的关系得到了加深，但欧洲其他国家，尤其是法国在发现美国在停火等关键问题上与自己选择了对立之后在盟友选择的问题上调整了策略，这对 1957 年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立起到了积极作用。而在面对核威胁时，法国人也发现了其不能完全依赖自己所谓的盟友，从而坚定了自身获取独立核武器的决心。

对于以色列而言，此次危机被认为是上一场独立战争，即第一次中东战争的延续：当一个主张泛阿拉伯主义、对犹太人国家抱有天然敌意的纳赛尔政权控制了埃及之时，作为其邻国的以色列自然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安全威胁。这一担忧在纳赛尔宣布封锁蒂朗海峡、掐断以色列通往红海的海上生命线后成为现实，而犹太人拒绝在建国后再次受人掣肘，并因此加入了英法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军在危机中成功地粉碎了纳赛尔的部队，征服了整个加沙和半岛，并到达了苏伊士运河。尽管来自苏联的军事和美国的经济威胁最终迫使了本 - 古里安撤离这些领土，但作为回报，他得到了美国对以色列防御及航运权利的承诺，后者推动了在以色列与埃及的边境和俯瞰蒂朗海峡的沙姆沙伊赫部署联合国维和人员的冲突解决方案。以色列暂时性地摆脱了来自埃及的入侵威胁，并通过海峡加强了与亚洲的商业往来，享受了一段前所

¹²² C. N. Trueman, *The Suez Crisis of 1956*, historylearningsite.co.uk.

¹²³ French Ministry of Defense archives ECPAD MO56141AR14.

¹²⁴ Chomsky, Noam, *The Fateful Triangle: The United States, Israel and the Palestinians*, New York: South End Press. p. 194.

未有的和平和繁荣时期。许多以色列人都认为 1956 年后的十年是他们生活中和国家历史上最美好的时光，直到纳赛尔在 1967 年 5 月单方面驱逐了联合国维和部队，并再次封锁了蒂朗海峡。

而对于埃及而言，在此次事件之中虽然在军事层面称得上失败，但在政治上却颇有成就。事后埃及在纳赛尔的统治下获得了来自苏联的一系列各方面的援助，其阿斯旺大坝也对整个非洲和中东的经济产生了影响。纳赛尔和埃及通过塑造自己危机中英勇反抗英法以三国入侵的英雄形象，逐渐以泛阿拉伯主义以及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领导者身份自居。同时，苏伊士运河危机中英法的黯然退场使得世界范围内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浪潮迎来了新的一波高潮，而作为这一事件的关键领导者，纳赛尔也成为继印度尼赫鲁、印尼苏加诺后又一名来自第三世界的国际政治明星，与南斯拉夫的铁托和加纳的恩克鲁玛一道推动了不结盟运动的蓬勃发展。

最后，围绕着苏伊士运河公司的法律地位等问题，埃及在危机中单方面采取的激进国有化政策以及其他可能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在一些批判者看来是一种对于联合国权威以及所谓国际法治进程的公然挑战。而在埃及的国有化是否具有合法性这一国际法问题之外，埃及在未击中并未按照联合国秘书长斡旋及安理会赞成的六项原则行事，以及以色列和英法两国绕过联合国使用武力，使得联合国在类似情况下处理国际和地区危机的能力再次受到了质疑。但仍不可否认的是，联合国在此次危机中开创的维和行动，即派遣调解员或观察团的模式在日后得到了沿用。虽然维和行动被哈马舍尔德称为“《联合国宪章》第六点五章”的规定，但这一模式对于调节未来的很多冲突局势，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附录：部分重要地理位置介绍

1. 塞得港：

塞得港 (Port Said) 位于埃及东北部，北临地中海，是塞得港省省会，人口约为 206,000 (1953 年)。这座城市始建于 1859 年，大部分位于人造土地上，位于地中海和曼萨拉湖之间的一条低洼沙地地带。塞得港地处苏伊士运河与地中海的交汇点上，横跨亚非两大洲，是世界最大的转运港之一，在埃及具有重要的地位。该港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凿而修建，以授权万国苏伊士运河海上公司开凿运河的埃及总督，穆罕默德·赛义德帕夏 (Mohamed Sa' id Pasha) 的名字命名。外港占地 570 英亩 (231 公顷)，经过精心设计，其两个防波堤可防止海水侵蚀运河。主航道长 2.5 英里 (4 公里)，两侧为开阔盆地。为了安置 1903 年至 1909 年间建造几个大型干船坞的工人，在运河的东岸修建了一个新的城区，被称为福阿德港 (Port Fouad)。该港被设计为一座国际化的城市，在 20 世纪早期曾居住着大量来自欧洲的居民，但是随着埃及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激烈化和 1952 年的“自由军官”革命，该港欧洲社区的居民人数大大减少了。运河危机期间，英法军队对塞得港发动了空袭并在该港登陆，联军同埃及军队以及武装起来的群众爆发了激烈的巷战，导致城区遭到严重破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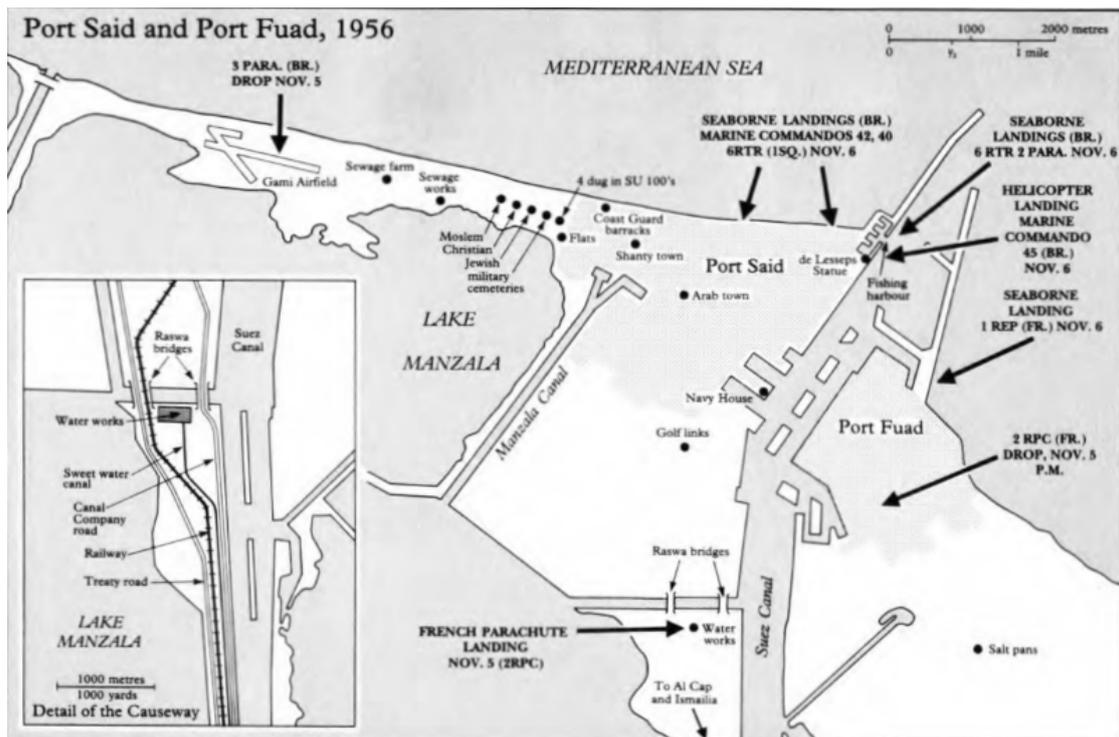


图 12：塞得港和福阿德港¹²⁵

2. 伊斯梅利亚：

伊斯梅利亚 (Ismailia) 位于埃及东北部，是伊斯梅利亚省的省会，人口约 91,000 (1954 年)。它位于苏伊士运河西岸，大约在其北面的塞得港和其南面的苏伊士两座城市中间。运河在该市境内加宽，与提姆萨赫湖相连，再往南则与大苦湖相连，隔运河向东则是埃及的亚洲部分西奈半岛。该城由法国工程师始建于 1863 年，作为宿营地以便官员和工人们休息，以当时的埃及总督伊斯玛仪帕夏 (Isma' il Pasha) 的名字命名。伊斯梅利亚市是苏伊士运

¹²⁵ Keith Kyle, *Suez: Britain's End of Empire in the Middle East*, preface.

河地区的中心城市，开凿运河期间为解决工程所需淡水，从开罗以北挖渠，将尼罗河之水引至伊斯梅利亚，然后北上塞得港，南下苏伊士城，同时这里还是苏伊士运河管理局所在地，被称为“运河女皇”。1952年，为了打击反英的游击战争并保护运河区，英国军队要求伊斯梅利亚的埃及警察投降但遭到拒绝，经过激烈的战斗后埃及警察被镇压。这一事件在埃及全国引起了反对英国占领的大规模示威和骚乱，而且是反对法鲁克王朝的革命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3. 苏伊士：

苏伊士城 (Suways) 位于埃及东北部，南临苏伊士湾，是苏伊士省的省会，人口约 144,000 (1953 年)。该城地处苏伊士运河南端，由新城、旧城易卜拉欣港及陶菲克港三部分组成。苏伊士是一个古老的贸易中心，是罗马城镇克利斯马城的所在地，奥斯曼征服埃及后，苏伊士发展成为一个海军基地，在奥斯曼统治时期，苏伊士是与阿拉伯、也门和印度进行贸易的主要港口，还是前往麦加朝圣的出发地。苏伊士运河开通后，苏伊士城重新繁荣起来，作为港口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在苏伊士湾内，有多个大型油田，是埃及的主要产油区之一。

4. 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 (Alexandria, al-Iskandariyyah) 位于埃及北部，尼罗河三角洲西北角，北临地中海，人口约 1,296,000 (1956 年)，是埃及第二大城市，也是埃及和地中海东岸最大的港口。亚历山大是拥有 2300 多年历史的名城。公元前 332 年，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占领埃及后建立此城，并以其名字命名，希腊托勒密王朝时期这里是埃及的首都，是古代地中海世界的知识和文化中心。19 世纪，奥斯曼帝国总督穆罕默德·阿里着手重建亚历山大，优惠的贸易政策，吸引了大批外国商人，这里成为埃及棉花产业的中心。1882 年，亚历山大被英军占领，成为英海军的基地，后来也作为埃及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总部。1954 年，以色列策划在亚历山大发动炸弹袭击以破坏运河区的安全，意图延缓英军的撤离，但是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史称“拉冯事件” (Lavon Affai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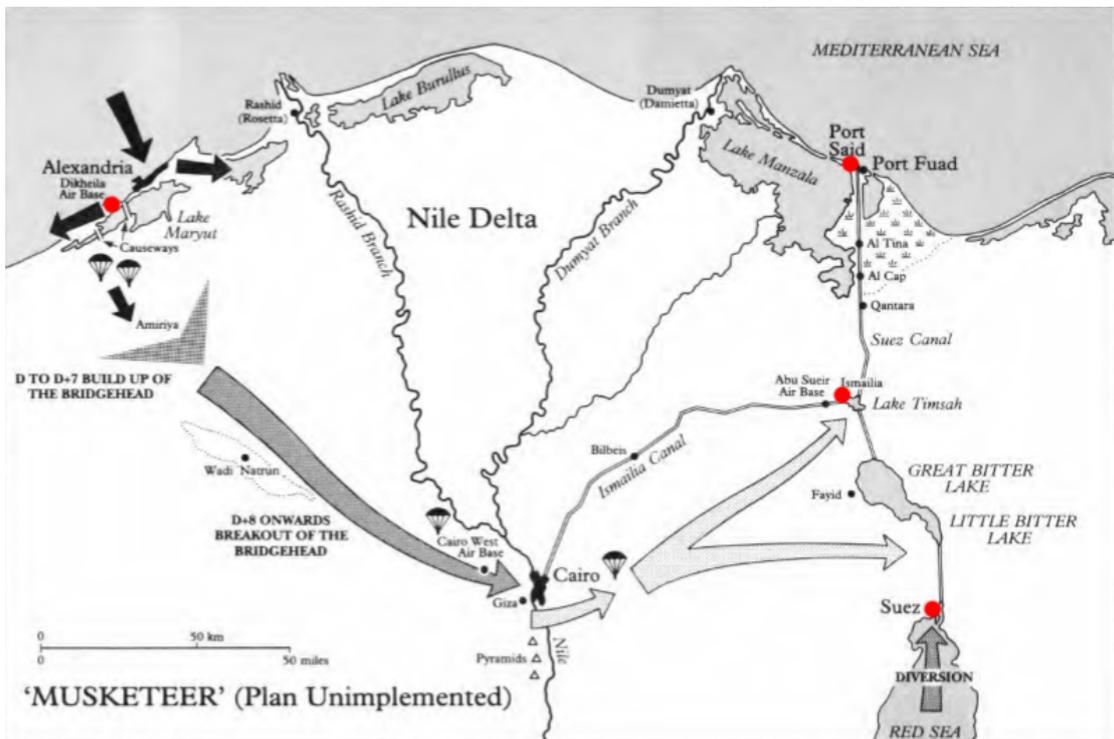


图 13：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用红点标注的地点为亚历山大、塞得港、伊斯梅利亚和苏伊士城¹²⁶

126 Keith Kyle, *Suez: Britain's End of Empire in the Middle East*, preface.

5. 西奈半岛：

西奈半岛（Sinai Peninsula）位于苏伊士湾和亚喀巴湾之间，西面是苏伊士湾和苏伊士运河，东面是亚喀巴湾和内盖夫沙漠，北邻地中海，南接红海，是亚洲和非洲之间的陆桥。它东西最长约 130 英里（210 公里），南北最长约 240 英里（385 公里）。半岛的绝大部分地区划分为两个省：南西奈省和北西奈省。其他三个省横跨苏伊士运河，并横跨亚非两个大洲：苏伊士运河南部的苏伊士省，中部的伊斯玛利亚省，和北部的塞得港省。半岛北部为高原，南部主要是 2000 多米的高山和峡谷。半岛内陆是干旱的沙漠地带，多山且人烟稀少，与内盖夫沙漠没有明确的自然界限，人口主要集中在北部沿海地区，该区域最大的城市是北西奈省的首都阿里什（Arish）。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纳赛尔出于保卫运河区的需要，停止了对西奈半岛的增援并指令西奈半岛的埃军向运河撤退，半岛大部遂为以色列军队所占领。在 1967 年的六日战争中，西奈半岛再度为以色列军队所占领，1979 年埃及和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其中以色列同意退出整个西奈半岛，直到 1982 年以色列军队全部撤出半岛。



图 14：西奈半岛与亚喀巴湾¹²⁷

¹²⁷ Maps of Sinai, <http://www.allsinai.info/sites/map.htm>, 2020 年 2 月 17 日登录。

6. 亚喀巴湾：

亚喀巴湾（Gulf of Aqaba）位于西奈半岛以东，阿拉伯半岛以西，最宽处仅 15 英里（24 公里），南北长约 99 英里（160 公里），中心区域的最大深度为 1850 米。湾区最大和人口最多的城市是约旦的亚喀巴城，以色列最南端的港口城市埃拉特（Eilat）坐落在海湾的最北端。亚喀巴湾在南端通过 13 公里宽的蒂朗海峡（Straits of Tiran）与红海相连，其入口处有蒂朗岛（Tiran Island）和塞纳菲尔岛（Sanafir Island）两个无人岛这两个无人岛如今属于沙特，但是 50 年代的时候它们被埃及控制，埃及可以借此封锁蒂朗海峡以阻止以色列船只进入红海。以色列建国之前并没有埃拉特这座城镇存在，该地根据联合国的巴以分治方案属于犹太国的一部分，位于以色列在红海狭窄的海岸线上的埃拉特对于以色列与亚洲和非洲的交通、贸易特别是石油的进口尤为重要，因此这里逐渐成长为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亚喀巴湾的通航始终是埃以矛盾中的一个重要议题。1955 年，为了调和埃以矛盾，由艾登牵头，英美提出了一个阿尔法计划（Alpha Plan），要求以色列割让内盖夫地区南端的两块土地分别交给埃及和外约旦，由以色列本土通往埃拉特的一条道路将继续由以色列控制，作为交换，美国和英国将保护以色列的领土和安全。但是埃及和以色列都不满意这个方案，阿尔法计划最终不了了之。苏伊士运河期间以色列曾经短暂地占领了蒂朗岛，在 1967 年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再次占领这里直到 1982 年。

7. 内盖夫地区：

内盖夫（Negev），也被称为南部地区（Southland），西侧与西奈半岛的沙漠毗连，其东部边界是阿拉巴谷，是一片面积约 13,000 平方公里（4,700 平方英里）的多岩石沙漠地区。在以色列国建立之初，根据分治方案，内盖夫地区面积上占整个以色列的约 60%，并且在亚喀巴湾有一段狭窄的海岸线，是以色列通往红海的出海口。在英国委任统治时，这一地区只居住着少量贝都因人和阿拉伯人，但是以色列建国后，这里吸收了大量犹太移民并成长出了一批城镇，但是该地区最大的城市还是前阿拉伯城市别是巴（Beersheba，一译贝尔谢巴），以面积来衡量它是整个以色列最大的城市（耶路撒冷未计入）。以色列建国后还通过管道从北方引水灌溉，在这一地区建立集体农庄，使得干旱的沙漠发展成重要的农业区。这里也是阿以、埃以冲突的主要地区之一，特别是在埃及和以色列的军事冲突中具有重要地位。

8. 约旦河西岸：

约旦河西岸（West Bank）是巴勒斯坦的一个地区，位于约旦河以西，总面积 5879 平方公里，其中死海水域面积 220 平方公里，陆地面积 5659 平方公里。根据联合国巴以分治方案，这一地区属于阿拉伯国的领土，其中耶路撒冷计划成立一个联合国管理下的特别国际政权，既不属于犹太人国家也不属于阿拉伯人国家的一部分。但是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希望夺回这片曾经属于哈希姆家族的土地，1948 年，他加入阿拉伯联军对新生的以色列国的进攻，约旦由英国军官训练指挥的“阿拉伯军团”（Arab Legion）被认为是阿拉伯联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在阿以战争中，“阿拉伯军团”始终远离分治方案中划给犹太国的土地，但是占领了约旦河西岸的大部，“阿拉伯军团”起初不想占领计划由国际共管的耶路撒冷，但是为了防止以色列人占领整座城市，他们迅速占领了耶路撒冷旧城，阿卜杜拉还让科普特主教加冕自己为“耶路撒冷国王”。

1949 年 4 月 3 日约旦和以色列签署停战协定，约旦控制的约 2100 平方英里（5400 平方公里）的西岸和包括旧城在内的东耶路撒冷，西耶路撒冷和剩余的巴勒斯坦领土则由以色列占领。次年，以色列宣布将耶路撒冷作为首都，约旦也将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正式兼并。在 1967 年的六日战争中，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都被以色列军队所占领，但是并没有被正式兼并，约旦保留对这部分领土的主权宣称直至 1988 年。以色列单方面将东耶路撒冷并入西耶路撒冷，并宣布“完整统一的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而约旦河西岸则在 1982 年埃以和平条约达成后，以色列开始逐步将权力转让给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



图 15：以色列地图，其中可以看到内盖夫地区、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位置关系和主要城市¹²⁸

128 Political Map of Israel, Middle East, https://www.nationsonline.org/oneworld/map/israel_map.htm, 2020 年 2 月 17 日登录。

9. 加沙地带：

加沙地带（Gaza Strip）是西奈半岛东北部地中海沿岸占地 363 平方公里的区域，位于巴勒斯坦西岸、西奈半岛东北部的狭长地带，长期以来一直是伊斯兰传统的宗教中心。在二战后原本在联合国规划中加沙地带将与约旦河西岸成立一个新的阿拉伯国家，但 1948 年阿拉伯联军对以色列发动阿以战争，加沙地带被埃及所占领，阿拉伯联盟于 1948 年 4 月在该地区成立了一个“全巴勒斯坦政府”（All-Palestine Government），得到了除外约旦以外全部联盟成员的承认。

阿以战争后，大量巴勒斯坦难民涌入加沙地带，给埃及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据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记录，1948 年加沙的难民人数达到 79,947 人。后来，埃及开始加强对于加沙地带的控制，全巴勒斯坦政府也在 1959 年解散，但埃及从未将加沙地带纳入其主权范围。埃及和以色列之间，围绕着加沙地带的军事摩擦始终不断。1955 年 2 月，以色列国防部长本古里安（Ben-Gurion）下令以军越过停战线，偷袭埃及在加沙的军营，杀死埃军 38 人，这是苏伊士运河危机前导致中东局势紧张的重要事件之一。

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加沙地带被以色列军队占领，但国际压力很快迫使以色列撤离。以色列在六日战争（1967 年 6 月）中再次占领该地区，并对该地区实施军事管理直至 1994 年。



图 16：加沙地带¹²⁹

129 不列颠百科全书, <https://www.britannica.com/place/Gaza-Strip>, 2020 年 2 月 17 日登录。